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资料

- 一、聊城县（筑先县）东南党组织的发展与
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王鲁光（1）
- 二、青年抗日挺进大队
——兼忆坡赵庄战斗……………姜虎祥（16）
- 三、在范筑先司令部军医院工作的回忆……………崔梦辰（22）
- 四、有关聊城县（筑先县）敌伪工作
情况的回忆……………张宗谦（25）

敌、伪、顽情况介绍

- 五、聊城县敌、伪、顽据点分布概况……………梁金中（30）
- 六、有关聊城县（筑先县）敌情概述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张宗谦（41）
- 七、齐子修与“三支队”简介……………翟世荣（50）
- 八、伪顽刘（中学）团的形成和覆灭
……………张宗训口述、张思俊整理、张炬供稿（57）

革命烈士传略

- 九、回忆父亲——赵以政烈士……………赵 斌
十、宋占一烈士史略……………张炬供稿
十一、王晋亭烈士生平简介……………李士钊

历史人物

- 十二、傅阁老……………范景华

古河道

- 十三、黄河流经聊城考略……………葛 洲

手工业

- 十四、聊城毛笔制作与刷纸业史略……………吴云涛

聊城县（筑先县） 东南党组织的发展与抗日民主 政府的建立

王鲁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和优秀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同志在指挥对日寇进攻聊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当时鲁西陷入一片混乱。

范筑先将军生前所领导的三十五个支队，其中一部分投降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一部分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积极抗日。那时日寇对鲁西进行疯狂扫荡，斗争非常残酷，我党转入地下，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我被分到聊城东南，执行党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初（农历腊月卅），我们青年抗日挺进队，住在冠县城外一里庄。早饭后，接司令部紧急通知，（鲁西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聊城敌人要扫荡冠县，命令我们马上到大峰山区去，部队准备好就立即出发了。黄昏时我们来到聊西南沙镇敌人据点西袁庄，当时就住在那里了。庄里的老百

姓，都正忙着过除夕。第二天，天刚亮，孩子们就辟哩啪拉的放起鞭炮，准备热热闹闹的吃年夜饭。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了马达声，随后，两架敌机便出现在袁庄上空，在那里盘旋侦察，有些老百姓一边往村外跑，一边大声叫着：“快跑，沙镇的鬼子来了”。孙立中中队长吹了紧急集合的哨子，很快集合起队伍，政治部阎主任对大家说：“敌人是对着我们来的，根据现在的情况，队伍不便转移，我们的队员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对此地很熟，我们要化整为零，以粉碎敌人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我们的队伍划分为七个小组，每个小组七八个人，要很快分散到各村去，我们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我被指定为小组长，阎主任讲完后，我就带着大家去了李维泗、李长安同志的家乡塘坊村。我和几个队员住在李长安同志家，其余住在李维泗家。晚上就地上铺了玉米秸，几个人盖一床被子睡了。由于队伍及时的化整为零，敌人在袁庄扑了个空，于是便把怒气发泄到老百姓身上。敌人又抓人，又抢东西，还烧了不少房子，就回据点去了。第二天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因敌人到处扫荡，队伍暂不集合，何时集合听命令。”七天后，阎主任在二张家村召开了各小组长会，传达了上级指示：“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发展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决定，青年抗日挺进队的队员分别回到本地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组织游击小组和抗日武装，狠狠地打击敌人，扰乱敌人。不是聊城县的同志暂随本县的同志进行工作。”会后，我和刘觉民（刘子华）把分散在各村的宗合成（宗署光）、王东洲、王庆芳、刘铮等同志召集

起来；当晚住在张振维同志家里，第二天我们绕过沙镇敌人据点，经过很多道民团和红枪会的盘查，天黑回到聊城东南我的家乡王寨。宗合成、王东洲、王庆芳同志都是本村人，各自回家去了。刘觉民等三同志当晚住在我家，第二天他便带着李英昌同志从王寨回到他家李海子村，刘铮同志仍留住我家。

二

王寨是聊城县和阳谷县各占一半的边界村，距东阿县的边界只有七、八华里，这里是聊、阳、阿三县的结合部，三县的鬼子和汉奸经常到这一带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地主豪绅伪区长孙仙秋，以保家为名组织了民团，很多村的农民为了保家，自发的成立了红枪会。群众生活很苦，不少贫苦农民没有饭吃，但广大群众抗日打鬼子的情绪很高。我们回到三寨后，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找青年以及贫苦农民多次谈话，使不少青年和贫苦农民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得解放，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打鬼子的。要不当亡国奴，就要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弟弟三陈洲由于受我的影响，对党认识的较快，积极为党工作，我首先发展他入了党。宗合成同志发展了裴永德（动民）同志入了党。王寨于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就成立了党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我们又在对党认识较快，表现较好并已具备党员条件的青年和农民中发展

了王如菊、王东洲、王如海、王九洲等同志入党。支部扩大后，我为了向外开展工作，党支书由宗合成同志接任。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宗合成同志又担任了新的任务，王陈洲同志接任了党支书。

裴寨是个大村，封建势力比较大，在外边求学的学生很少，这里的工作如何做呢？开始我们认为先找几个从小的同学，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发现好的吸收入党。不料一找他们，有的不敢见面，有的虽见了面，但不敢表态。有的则认识很差，不论说什么他都不听。针对这种情况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王寨党支部的农民党员王如菊同志去裴寨发展党员，因为他与那里的农民都认识，有联系，容易接近他们。当把这一任务交给他时，他工作热情很高，并说：裴寨离我们村很近，白天没时间，晚上去做工作，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工作，发展了贫农裴连珂同志入党。这个村有了党员就好办了，接着由裴连珂同志又发展了农民裴协然、裴文奎等三名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建立了裴寨党支部。

我和宗合成同志以看病为名，到王寨附近的祝寨，找青年中医祝学士对他进行培养教育，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他的觉悟提高了，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培养成熟就吸收他入了党。入党后他工作很积极，他又比较快的发展了青年学生王廷臣等入党，建立了祝寨党支部。

王寨附近的两个村子建立了党支部后，再向外村发展党

的组织感到不好入手，因为当时要到外村去，一些伪区、乡、村人员不是盘查就是报告敌人。当时敌伪规定，谁家来了客人，就要报告伪乡、村长，如不报告，就以私通八路论处，不是抓人就是罚款。怎么办呢？经反复研究，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发动现有党支部的党员积极向外村发展党员；二是，我们利用赶集的方法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发动新党员向外村发展党，他们都很积极，愉快的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有不少党员克服了种种困难，积极外出完成发展党员的任务。利用赶集的办法是，每逢有集就到集上有目的找那个人，一个集找不到，就两个集，三个集地去找。找到后，一同到集边上或店铺里谈话。一次不行就约定下次再谈。就这样，在周店发展了家住周店镇上的苗纪臣同志；在周店大桥边发展了谭文化（谭启明）同志；在五乡杜发展了杜万泉同志；在七级镇上发展了杜立志同志。这些同志入党后，工作都非常积极，他们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都在本村或本镇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李海子村条件艰苦，刘觉民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克服了很多困难，发展了本村上的刘锡爵同志，成立了李海子党支部。接着又在梁庄发展了梁金柱等同志，成立了梁庄党支部。在小韩庄发展了韩学读同志。这时，我和刘觉民同志在外村直接认识的人没有了，怎么办呢？当时我们除了推动现有的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外，决定要在几个基础较好的村子发动贫下中农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会），通过成立农会，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贫雇农党员。

积极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利用晚上首先在王寨、祝寨

找青年和儿童教唱抗战歌曲，扩大政治影响。如，我们都是“神枪手”、“大刀进行曲”等。在开始教唱时有的大人害怕不叫小孩参加，把孩子叫走，不久小孩又回来了，时间长了也就不管了。通过教唱抗战歌曲，对青少年和儿童教育鼓舞很大。他们从村内唱到村外，不久附近村子里的青少年也自动的唱起了抗战歌曲。这催人向上的歌声，大大地激起了青少年和儿童的抗日热情。刘觉民同志在李海子也教唱起来。

张贴标语，加强宣传工作。我们常写些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等。派党员到李海务以北和一些集上，夜间张贴，这些宣传品，大大的鼓舞了群众，打击了敌人。

在王寨组织了以王庆禄、王如章、王如海三人游击小组，他们经常深入敌区骚扰敌人，割敌人的电线。使敌人通往李海务等地的电话常常中断。这个游击小组非常活跃，很能吃苦。在敌众我寡的恶劣形势下，在冬天越是下大雪或刮大北风，他们越出来活动；在夏天，越是下大雨或很黑的夜间，越要出动。一九四〇年王庆禄等同志，深入到聊城城边割敌人的电线，被发现了，不幸王庆禄同志在马官屯一带被捕，受尽了折磨，不久就将他送往日本当劳工。直到日本电子投降后，才被送回国来与家人团聚。

由于党员的积极活动，和游击队、游击小组不断的打击敌人扰乱敌人，更加引起了聊城敌伪的注意。敌人为了加强它的统治，不断地到五大寨（王寨、裴寨、祝寨、任寨、张

李寨)和太平庄一带扫荡。敌人来时,党员就领导群众退到村外,组织游击小组打冷枪,扰乱敌人,使敌人进村找不到人,却感到处处有八路军和游击队,使敌人恐慌不安,不敢久打,很快地逃回敌穴。

三

一九三九年四月,阎戎同志来聊东南检查工作,住在我家,第二天召集刘觉民、李英昌我们几个开会。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后,他说:“接上级指示,我们的部队不再集合,队员都要转到地方,以加强地方工作。你们几个和新发展的党员转到聊城县去,李英昌、刘铮同志转到禹城县去。”他讲完后又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后,分别给我们写了介绍信。第三天他亲自召开了王寨党支部会,讲了形势与任务,并表扬鼓励了大家。几天后阎戎同志由我陪同到李海子刘觉民同志家住了几天,检查了工作,就回聊西去了。李英昌、刘铮同志带着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化装经过茌、博平敌占区到禹城县去了。他们走后我和刘觉民同志组织党员到地主最多贫雇农也最多的孙堂,最穷的东西太平庄发动贫雇农组织抗日农民救国会。同时,在王寨、裴寨、李海子成立了农会。在发展的农会会员中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壮大党的力量。在向孙堂进行工作时,首先碰到的是地主的破坏,有的地主公开威胁积极分子说:“你们不怕日本人杀头烧房子嘛!不怕把你们种的地收回嘛!”有的地主利用狗腿子进行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积极分子不敢发动了,农会成立不起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及时研究采取了措施,写

了标语夜间贴到孙堂街上，如违破坏农会的成立，就打倒谁！破坏农会绝没有好下场等。标语贴出后，对贫下中农是个很大的鼓舞，对破坏成立农会的地主和狗腿子是个很大的打击。这样有的地主就不敢再公开破坏了，有的变换了手法，采取了收买手段，如给贫雇农送粮食或买了粮食少要钱或不要钱，有的少收或不收地租等，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贫雇农，破坏农会的成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教育贫雇农提高觉悟，揭露地主的阴谋，狠狠打击地主的破坏行为，使农民懂得只有成立了农会，地主才不敢欺压农民。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孙堂和东西太平庄的农会成立起来了，这对其他村影响很大。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我和刘觉民同志，为了与东阿县委取得联系，我们到东阿县开主党的秘密联络站——陈兰怀同志家，找县委秦延彬同志请示工作，但秦延彬同志已到老秦庄一带去了，陈兰怀同志告诉我们，今天地委负责人申云甫同志去阳谷路过这里，你们可找他谈谈。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身穿浅蓝色衣裤，头包一块破毛巾，脚穿一双铲鞋，手提三包中药的高个子，兰怀同志说：“云甫同志来了。”于是大家都站起来了，兰怀同志作了介绍，申云甫同志很热情地问了情况，我们向他汇报了几个月的工作并说明了要向鲁西北地委转关系的情况。他对我们谈了形势与任务，并指示我们要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教会，组织抗日武装，关系未转之前，可在聊东南一带建立区委，以便领导聊东南的工作。当时指定我任区委书记。谈完后，吃了午饭，我们就回聊东南。在回去的路上研究了申云甫同志给我们指示的工

作。

四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我和刘觉民同志去莘、冠边一带找地委。到了冠县叶庄找到了地委组织部长郭林业同志，交了介绍信，向他汇报工作后，他鼓励我们，并告诉我们地委书记张丙元同志为党的工作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了，要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好，他还说：“地委把你们的组织关系转到聊城县委会，县委就住在聊城西南孙丰老庄，到那里找组织部长孙玉珠或宣传部长孙玉贵同志都可以。”第二天我们去孙丰老庄，找到了孙玉珠和孙玉贵同志，和县委接上了关系。晚饭后，县委书记孙寒光同志来了，我们向县委汇报了工作和地委的指示。县委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寒光同志说：“聊城是鲁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的当权者对聊城都很重视，统治很严。现在鬼子为了控制鲁西，在聊城住有重兵，控制聊城比鲁西各县更严。由于敌人对聊城的严格控制，我们的党组织多分散在边界地区，县委直接领导了聊西南和聊西的党组织。还领导聊东南老韩庄一个党支部。聊城城内，聊东北，聊北都有党组织活动，但都未接上关系，你们回聊东南后，要与老韩庄党支部接上关系。”他并提出要我参加县委任民运部长。接着研究了工作，布置了任务。第二天我们回到聊城东南。经研究决定分两片召开支部会，传达贯彻地委、县委布置的工作。因当时形势紧张，我在王寨西河滩里的一座破窑里召开了党支部书记会，在会上传达了地、县委的指示，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会议大致决定了以下

三条：

①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当播种机，积极地在本村特别是在外村发展党员；②通过建立农会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贫雇农党员；③凡有条件的乡村安排党员担任伪乡村长，直接掌握乡村政权，为党工作。不能直接由党员当伪乡村长的地方，要积极做好伪乡村长的工作，使他们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保护群众利益。会后，每个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经过艰苦的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新的党支部。又有几个村子成立了农会，如梁庄、刘皋等，没有建立农会的村子也找到了积极分子。五大寨、李海子的村政权直接地或间接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做好伪区长和红枪会的工作，为大力发展党组织创造条件。伪区长孙仙秋是地主出身，他除掌握少数伪兵外，还掌握了孙堂一带的民国，又与两个红枪会头子刘锡光、陈玉怀有来往。后来，陈玉怀投靠了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为了做好孙仙秋的工作，我和刘觉民同志通过刘锡光找了孙仙秋。当时孙为了站住脚，也积极地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向他宣传了我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指出了他的出路，经过多次教育，他对共产党才有了一些认识，逐渐形成了两面人物。当形势对我们有利时，他就主动地和我们联系，给我们的游击队送情报，动员村长给我们送公粮，不阻碍农会的活动等。当形势对我们不利时，他就回避我们，不听招呼。对此，我们向他提出了多次警告，并指出他不能搞两面派。他表示：“我一定要对共产党八路军忠诚，对鬼子应付。”我们说：“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八路军和老百姓就会原谅

你，不然群众是不会原谅的”。

有一次我们为了营救抗日四大队的一个被汉奸陈玉怀部俘虏的战士，找了孙仙秋，叫他亲自去找陈玉怀要出被俘的战士，他同意了。他为了表示真心实意地办这件事，以取得我们对他的信任，他提出叫我打扮成他的表弟同他一块去。对此我们认真进行了研究，对孙仙秋和敌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到敌人据点去虽然有些危险，但可以借此机会摸清敌人内部的情况，只有入虎穴，才能得虎子。于是决定我和孙仙秋一块到汉奸陈玉怀的据点去一趟。我穿上天蓝色的洋布长衫和孙仙秋一同坐车到花牛陈敌人据点。进去后，看到汉奸陈玉怀的据点，岗哨林立，戒备禁严。在敌人据点里虽然孙仙秋出了很大的力，使了很大的劲，但由于汉奸陈玉怀不听劝告，顽固不化，因而未能要出被俘战士。虽然如此，但此次去敌人据点收获却是很大的。其一，我们看到了孙仙秋对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其二，我们进一步认清了陈玉怀是一个死心踏地的汉奸，反动气焰非常嚣张；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了解到敌人的一些情况，知道了我们的战士被关在什么地方。回来后，我们立即将搞到的情况告诉了抗日第四大队长徐翼同志，他据此作出了伏击敌人的战斗部署，组织四大队战士伏击了汉奸陈玉怀，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救出了被俘战士。

作好刘锡光的二作，掌握红枪会。刘觉民同志与刘锡光是同村同族，过去关系就不错。刘觉民同志主动找了刘锡光，向他说明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八路军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政策，提出了红枪会应该是保家卫国的组

织，如只保家不卫国，国家亡了，家也保不住的道理，同时向他说明鬼子正在利用红枪会为他服务，陈玉怀不是被敌人利用当了汉奸了吗！你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你要和老百姓、八路军、共产党站在一边，打击敌人，保卫家乡。刘锡光虽然开始不大相信，后经李海子党支部向刘锡光和其他会员进行宣传教育，使刘锡光和一些会员有了些认识，逐渐的靠近了我们。再加上经常看到鬼子汉奸到处烧杀，抢东西，这更激起了红枪会对日寇的愤慨。有一次鬼子和汉奸到李海子一带扫荡，刘锡光亲自领导红枪会打败了敌人，粉碎了敌人狂妄的阴谋。那次的战斗，虽然红枪会伤了几个人，但却大大的增强了抗日的信心与决心。此后，我们在这个红枪会会员中发展了党员。该会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根据县委指示和老韩庄党支部接上了关系。从阳谷县委转来了刘庄党支部书记刘泽民同志的关系，从东阿县委转来了于梁庄于凤山同志党的关系。到一九三九年秋，聊东南一带有很多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党的个别关系。有些村建立了农会组织，有不少的村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整个形势是很好的。

五

一九三九年秋，地委将聊东北沈廷梅同志领导的北杨集、大孟营等党组织，划归聊城县委领导。地委派张武云同志来聊城县任县长，当时的县委书记孙寒光同志在聊城南刘集村召开了县委会，参加县委会的有孙寒光、孙玉贵、孙玉珠、张武云、杜治国、王清洲（王鲁光）、刘觉民、沈廷

梅、李诚等同志。孙寒光同志在会上说：“这次县委会讨论三个问题：一、县委的变动与分工；二、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成立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划区问题。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县委委员及其分工是：孙玉贵任县委书记，张武云任县长，孙寒光任县政府秘书，杜治国任组织部长，王清洲任宣传部长，刘觉民任民运部长，沈廷梅任动委会主任，李诚任县政府财粮科长，原组织部长孙玉珠同志根据工作需要，回聊西南孙老庄一带坚持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接着又研究了县政府的成立。当时县政府的机构是很精简的，只设县长一人、秘书一人，秘书下设有几个干部，分管政务和事务工作：有一个通信班等，一个财粮科，科设几个干部，主管钱粮的征收和钱粮供应工作。还决定将段景秋、韩培成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县抗日大队，大队长由张武云同志兼任，段景秋、韩培成同志任付大队长。最后，研究了划区问题。会议决定，暂划四个区，一区以老韩庄为中心，区委书记谭文甫，区长谭文琅。二区以孙堂为中心，区委书记刘觉民兼任，付书记宗合成，区长韩效民。三区，以顾官屯西为中心，区委书记于凤山，区长张佃一。四区，以大孟营为中心，因当时那里党的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差，我们的队伍又很少到那里活动，因此决定暂时不成立区政府，只建区委，只派吕清甫同志为区委书记，成立区委会。决定一、二、三区队由各区自己组织，各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在刘集街上召开了村长和群众代表大会，在会上由孙寒光同志宣布了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宣布了县政府和县大队的负责人，宣布了一、二、三区的划分

和各区负责人，接着，张武云县长和孙寒光秘书讲了话，当时群情振奋，有的自动喊口号，拥护县抗日民主政府！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村长代表和群众代表都讲了话，会议开的很好。会议结束后，县委召开了县区有关同志会议，征求了各区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拥护县委决定，并表示坚决完成县委交给的任务。当晚各区回到各区，县机关和县大队都转移了。

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各区委会、区政府和区队都建立起来了，有的区队发展到三四十人。县政府建立后，对敌斗争的形势更加尖锐、复杂、残酷。虽然鬼子汉奸不断扫荡、袭击我们的县区政府和县区队，但各区都能坚持在本区活动，有时敌人反复扫荡清剿，区政府和区队就暂时到外区活动，但很快就回本区。县政府和县大队，经常活动在聊、阳、阿边区，有时到外县活动，也很快回到本县。四区区政府和五、六、七、八区，这五个区是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逐渐成立的。城北的党组织是一九四〇年冬才与县委接上关系的，当时党的负责人是柴龙同志。

一九三九年底，地委决定调孙玉贵同志到聊西南工作，由李颉同志任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七、八月间，张武云同志调走，由牛连文同志任县长，兼任县大队长。他到职后，领导县大队和县政府积极开展活动，经常挺进到聊城附近，有时到聊城北活动，不断打击敌人，扰乱敌人，把敌人搞的晕头转向，不敢轻易出城。聊城的局面很快地打开了，根据地扩大了，群众要求参军参战的情绪更高了，我们的县区武装更加扩大了。聊城城内的党组织于一九四〇年冬，由赵健

民（赵以政同志的弟弟）同志通过我们的敌工人员和县委接上了关系，从此聊城县的党组织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一九四一年春，牛连文同志调走，张侠同志继任县长后，领导聊城县的人民群众和各个阶层组织了民兵自卫队，组织了联防，不断地打击敌人和区乡伪政权。敌占区继续缩小，根据地逐渐扩大，大大坚定了全县人民抗日信心与决心，巩固了县抗日民主政权。

青年抗日挺进大队

——兼忆坡赵庄战斗

姜虎祥

(一)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平、津、德州、济南一带相继沦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把十几万大军撤到黄河以南。在这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亲自率领所属部队，以聊城为中心，坚持开展抗日战争。

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范筑先亲自领导建立了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它是一支由青年学生自愿参加组织起来的抗日救国的坚强队伍。由范筑先的次子范树民任大队长，共产党员任方、阎斌分别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建立不久时参加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驻在聊城城内古楼西，原专署的东院里。三、四月间，大队移驻城里宗口南，路西一家民房大院，人员扩大到七十余人。我编在第二分队第四组，组长

王安全，副组长王清州（即王鲁光，现任江西省赣州行署专员）。这时聊城拳师杨金生教练的武术队，也参加了挺进大队。六月，又搬到三师附属小学（现新华舞台），人员增至百人。

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建立后，军事和政治学习十分紧张。军事训练由副大队长高庆云（外号高二虎）负责，这是一个军阀作风严重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不久被清除出队，由李钟铃（共产党员）继任。政治教育由阎戎主任负责。每天清晨起床跑步，上午出操，中午讲课，下午继续出操，晚上开会或学习政治，每天训练都在八小时以上。我就是在这期间由孙瑞锦同志（现在中央二机部）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还没有公开。

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全体队员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除完成了规定的操课外，还学会了三十多支抗日歌曲。整个聊城到处都响彻着抗日歌声，这歌声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鼓舞了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二）

一九三八年八月，鲁西北抗日武装为了配合保卫大武汉，组织了济南战役。挺进队全体队员，虽然都是青年学生，没有打过仗，但同学们有高度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纷纷要求参战，到前方开展武装宣传。经过上级批准，由各支队抽调枪

支，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二十发子弹，两枚手榴弹。拿到枪支后，大家兴高采烈，抗日情绪更为高涨。八月中旬，政治部开了欢送会，队伍开赴济南前线。我当时编在第五小队，担任副小队长。一路上，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白天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召开群众会，书写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宿营后，一边宣传，一边帮助群众担水，打扫庭院，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第一天经广平到茌平（住了一宿），第二天抵达潘店，住了五天。

八月二十五日，全队到达济南前线总指挥部驻地——齐河县焦庙。范筑先司令不让我们再往前去。他说：“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年纪小，没有作战经验。打仗不是开玩笑，要动真刀真枪，怎么行呢？”经过我们再三要求，他还是不放心，最后才决定亲自观看我们的野外演习。第二天，范司令来到了挺进队驻地，队伍集合起来拉到了野外，全队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进行了激烈地战斗演习。我们演习了散兵行、散兵线、散兵群……等战术动作，一个个摔打滚爬得满身泥土。范司令看了，表示满意，随即集合队伍讲话。他对我们要求参战的精神进行了鼓励，还亲自向大家作了“车轮战术”的实地演习。最后范树民根据范司令的指示，挑选了身强力壮，枪支好的五十名队员，分为三个小队，由他和参谋长何方、主任阎戎带领，继续东进，其余队员都留在后方焦庙。我被挑选上编进第一小队。翌日（八月二十七日），我们这支新组编的精干队伍，到达齐河县城西十二华里的坡赵庄。

由于日寇事先侦察到我们行动的情报，秘密抽调了齐

河、禹城、晏城等地的日伪军五百余人，趁着夜晚将坡赵庄团团围住，可是挺进队还一无所知。拂晓前，我们还在熟睡中，哨兵听到村外有汽车声，村内狗乱吠，急向队部报告。队长范树民一面派人到村北侦查，一面紧急集合部队。我们来到街上，正好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可能是二十九支队来换防的。”（原来挺进队进驻坡赵庄后，范筑先为了加强齐河兵力，决定调二十九支队和十九支队换防）。话音未落，从村北打来了三炮弹。在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中，还响起了机枪、步枪声，硝烟笼罩全村，敌人摸上来了。当时我们毫无准备，情况又不明，形势十分紧急。范树民队长当机立断，下令第一小队往村南突围，他亲自率领二、三小队向村西南突围。可是，敌人早已在村南不远的聊济公路设下了埋伏，麻子棵下隐藏着机枪阵地。我随着一小队冲出村南约五百米，就遭到敌人机枪的迎头射击。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大家都奋勇向前，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阵，一排排步枪子弹射向敌人，喊杀声惊天动地。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武器占绝对优势，我们又是仓促应战，损失很大，枪声很快就稀疏下来。这时，西南方向也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呐喊声中掺杂着一阵阵的手榴弹的爆炸声。我们正面的敌人吹着哨子，杂乱的向西面包围过去。我和贺立德同志（现在南京工学院人武部），趁这机会，从一块未收割的谷地里，冲过了济聊公路，突出了包围圈。

突出了包围，我和贺立德又累又渴，在离坡赵庄约三里的一块西瓜地里坐下来喘息。当看瓜老人知道我俩是挺进队队员后，送来半个西瓜说：“你们打鬼子辛苦了，吃点瓜

吧！”我接过西瓜，道了谢，拿出一角钱，老人不收，我解释说：“这是我们的纪律，你要不收钱，我们就只好要瓜了。”老人听后才收下了钱。我俩拿着瓜，一面吃，一面走，在离坡赵庄约八里地，遇到司令部的十几匹探马。他们询问了战斗，告诉我俩说：“司令部已由焦庙转移到华集。”于是我俩直接奔向华集。

到了华集，大队长范树民牺牲的消息传来了。范司令随即命令他的保卫队带着几挺机枪，集合挺进队员（包括我们这些刚回来的队员）又返回坡赵庄。大家怀着为牺牲的同志复仇的怒火返抵赵坡庄时，日寇已经撤走了。这一战斗，大队长范树民，参谋长何方，原一分队队长苗玉池，原三分队长卓自成，队员王安全（原四组组长），孙振峰、焦锡海、刘永贵等共计牺牲官兵二十一名，负伤六名。我军击毙日寇七名，其中少尉军官一名。

（三）

我们将牺牲的战友运回潘店，随即装棺入殓，运回聊城。在聊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烈士遗体离家近的，都一一送到家去安葬；外省和离家远的暂时埋葬在聊城苗圃（即现龙湾夏庄东边）。每个墓前立了石碑，刻有烈士姓名，家乡住址，永作纪念。

坡赵庄战斗后，挺进队没有被这次严重打击所吓倒，不久由上级委派，范司令的次女范树琨接任队长职务，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后来，为了培养人材，根据自报和上级批准的原则，全体队员分为三部分：有的到军事教育团

学军事（团长范筑先。教育长袁仲贤）；有的到政治干校学政治（校长范筑先。主任张郁光，是高级参议，共产党员）；还有一部分留本队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我就在这时离开了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分配到了军事教育团。

坡赵生战斗至今已有四十五年了。烈士们为国家、为民族的大无畏的忘我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已牺牲的战友们的英雄形象，时刻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引起无限怀念。我们有幸活到现在的人，当时是青年学生，现在已两鬓斑白，年逾花甲，但在四化建设中，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力，决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切力量。

在范筑先司令部军医院

工作的回忆

崔梦辰

一九三七年冬范筑先专员在聊城领导群众抗日，部队番号山东省第六区游击总司令部，后改称为山东省第六区保安总司令部。

一九三八年初，以当地开业医生徐耀庭为主，成立了司令部军医院，院址在古楼北原县卫生院旧址，属司令部经理处领导。当时医护人员很少，只有徐耀庭（恩县人，为少校军医），杨德信（济南人，为上尉军医），田祥国（莘县人，为上尉军医），李洪魁（恩县人，为中尉司药），乔兴甫（聊城人，为文书）和看护兵八人。

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军医院任少校军医。由于医务人员缺乏，二月间我们举办了一期军医训练班，招考培训了博平、茌平、聊城、阳谷、清平等县选送的学兵四十人。三个月培训后，军医院留用十人，其余分发各支队军医院工作。

当年夏季，来聊投效抗日的医务人员有少校军医李时恕（禹城人），上尉军医王凤章（平原人），中尉军医明泽斋（聊城人），那时收容伤员二十余人。但自日寇陷东阿和在濮县与日寇一次激战后，伤员急增至近百人。随即在北口百增设伤兵院一所，添司务长二人，军需一人，文书二人，还招

收了看护兵二十人，炊事员二人，通信员二人。

军医院全体官兵，在药品极度缺乏的条件下，日夜紧张地工作，每天门诊病员四百名左右。科室因陋就简，内服药中西并用；外用药极缺，且无处购买。我们就用牛油代替凡士林配药膏，用盐水为伤员冲洗伤口换药，以酒代替酒精，买旧蚊帐在护城河洗涤后再消毒作为纱布，把棉花洗涤脱脂漂白消毒后作药棉用，以粗布作绷带，用牛皮纸条沾浆糊代替胶布。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创造条件为伤员挖取枪弹、炸弹皮，对创面切开缝合，换药引流等，均取得了很好的医疗效果。全体军医及看护兵，每人每月只领取微少的维持费，在范专员抗日救亡的领导下，忘我的为伤病员努力工作。范专员曾数次到院慰问伤病员，并关心指导军医院的一切工作。

同年夏，堂邑范儿庄天主堂神甫阎宰铎自备药品，带领数位医务人员在聊城成立第二伤院。阎神甫以天主教名义，由天津代购了两千元的药品器械，解决了缺药的困难。安乐镇纺织厂代织了细布作纱布绷带。从此也能为伤员作截肢等较大的手术。

中秋节后，军医院与第二伤兵院合并。由阎宰铎神甫任上校院长，我与李明恕为中校副院长，管理业务。同时增添了少校军医刁名山，上尉军医周宝柱，中尉军医王筱洪等十余名军医。提升了杨德信、田祥国为少校军医，还提升了中尉、少尉军医十余人，看护长二人。增添了医兵四个班，文书四人，军需二人，副官二人，炊事员八人。

由于盘据东阿的日寇有侵犯聊城之势，军医院奉令迁至

堂邑郭关庙，聊城留守一个医务所，有军医二人，司药一人，通信员一人。徐耀庭为随从范专员的军医。凡伤愈致残的伤员成立一个荣誉队。堂邑县拨给一排战士保卫军医院。

军医院迁出二十余日（阳历九月二十三日），日寇侵占了聊城，范专员壮烈殉难，徐耀庭及通信员吴效忠都牺牲城里。当时军医院李明恕、田祥国、王凤章均回家探亲不在医院内。我们由于失去了组织领导，为了避免日寇骚扰，将轻伤员动员其自投亲友，重伤员分散安置在几个村内群众家中。所有药品寄存在阎神甫的天主堂内，医院人员多数分散。我带领二名军医，一名司药，一名副官在附近村中活动，几次探访了疏散的重伤员。由于时局日趋不安，我们数人最后在沙镇南一个村外含泪分手。范专员总司令部军医院就此结束了。以后，王金祥窃据专员，叛变了革命。阎神甫被土匪打死。

×

×

解放后李明恕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刁名山在博平县医院，杨德信在聊城县医院，王凤章在平原县公社医院，田祥国在长沙市医院，李洪魁在城武县医院，李锡祺在博平杨官屯公社医院，明祥斋在聊城阎寺公社医院，朱之纲在阳谷县医院，张曰遵在阳谷县防疫站。

清平剧院刘金芳经理，聊城汽车站邢智山科长，聊城地区公路管理段崔久昌段长，济南市防疫站雷守正大夫，聊城城关公社医院赵金荣院长（已故），乔瑞生医生等，都是一九三八年军医院培训的医兵。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有关聊城县（筑先县）

敌伪工作情况的回忆

张宗谦

一九四〇年春，汉奸政权和顽军三支队的反动势力伸到了聊城县蒋官屯、孟庄一带。为了了解伪顽情况和瓦解伪顽军队，我四区区委书记孟筱彭同志派我去争取在聊城东北打游击的顾邦安部。我约李德氏（党员）、赵居中、李秋实（赵李两同志都是愿在我党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一起去做顾邦安的工作。谈的结果，顾很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这时，国民党县长刘佩之也想争取顾邦安。他通过国民党乡长周云汉，委任顾邦安为国民党县政府警卫连长。我们几个感到，顾邦安在三支队和汉奸的夹击下，确无法独立活动（因离我根据地太远），其部下都未经工作，如拉到解放区去，很可能把这支小部队拉垮。因此，我们几人同意他接受刘佩之的委任，并让赵居中同志进入该连，名义上是任文书，实际上是作为顾邦安政治上的助手。我和李德民同志也随去国民党县政府观察动向。后因三支队政治部科长张龙轩对我们有怀疑，我和李德民同志离开了国民党县政府。约在两个多月后，赵宏光同志也退了出来。

我离开顾部后，打入到城南伪双庙据点约两个月。在那

里发展了许文德、张子安两个同情关系。许文德同志始终忠实于我们，以后才了解到张子安开始就对我们耍两面派，到他投国民党后，就完全忠实于国民党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调地委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六月调我到筑先县委敌工部工作。那时敌工部初建，只我一人，直接受县委书记李苏同志领导。约在一九四二年春，于化民同志任敌工部长。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起，我到聊城东北一带活动。根据李苏同志的指示，我先把四区区委过去派入伪军、伪组织的党员接过来。当时四区区委书记孟景霞介绍给我的同志有：任土山寺乡伪乡长的王成英（党员）；在伪梁庄乡公所当乡丁的姜继赢（党员）；在三支队任骑兵连长的姜继成（党员）；在三支队当文书的张学江；在三支队当兵的张学海（党员），该人一直不敢和我接头，结果把关系丢了。还有当时当红枪会分会长的王天环（党员）。

以后，我又见到顾邦安。那时他已活动好到梁庄乡任伪乡长。他很高兴又和我们联系上。我又去双庙联系上许文德和张子安。王成英又给我介绍了工作关系周广道（周在一九四一年初，就在王成英的领导下给我们送情报）。

在接好这些关系之后，就进行新的打入工作。当时敌人开办“华系指导官训练班”，要各乡保送一人，我和孟景霞同志商量要李德民同志经王成英同志保送到该训练班受训。此外，我又动员赵居中同志去受训，经过王世隆屯乡保送，赵居中也打进去了。

“华系指导官训练班”约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开始，同年

十一月或十二月结束。在训练班中，赵居中同志发展了在那里受训的齐国辉为我们工作，我争取了全秀山（全洪岭）为我们工作。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红枪会开始活动，我与在我们十支从回来的朱法信同志接头后，布置他做红枪会的工作。

经过一段工作考验，由我和李德民同志做介绍人，经县委批准，并派刘子华同志亲自主持吸收了赵居中、顾邦安、李秋实三人入党。以后又个别吸收了齐国辉、朱法信、周广道同志入党。

为了进一步掌握控制伪军，在一九四二年又选派了党员袁兆清到顾邦安部当兵，选派了同情分子刘甲范到顾邦安部当班长。当时顾邦安的传令兵高秀生，顾昌年知道我是八路军，他们也知道顾邦安听我们的话，很注意保护和领去隐蔽的同志，但他们始终没达到工作关系的程度。

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准备发展成工作关系的对象王成恩到顾邦安部当勤务兵。

在伪土山寺乡，我们派了孟庆良（党员）去当会计，选派了张廷贵去当伪乡队的班长，选派了金庆林（党员）当伪乡丁，同时争取了张景山、代伯明为我们工作。

一九四二年，李德民介绍李庆海到土山寺伪乡队当兵。以后又把他转到梁庄，后又转到伪三区。那时，他也和王成恩一样作为工作关系对象来培养的。

在伪新民会中，赵宏光同志争取了孙树蕃（即孙郁中）同志为我们工作。还争取了张云亭为我们的同情关系。张云亭的家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几年间，成为我和地下

工作的同志接头地点。

经齐国辉同志的动员，李金玉同志到我县委工作，后又经齐国辉同志派李金玉同志打入付立功部去进行工作。齐国辉同志还发展了王宪安为我工作。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设法让党员李德民同志当了伪三区乡长。我们为了完全控制伪三区，即让孟庆良同志（党员），金庆范同志（党员），李秋实同志（党员）都到伪三区当助理员，让刘甲范（党员）到伪三区队任队长，让张廷贵和袁兆儒（党员）到伪三区队任班长，让代伯明、李庆海、袁子禄（党员），张士林、张德夏都去伪区队当伪兵，并布置这些同志在里边找出身好、作风正派的人交朋友，计划在很短时间内把伪区队变成从上到下，为我们掌握和调动的武装。

还选派了老党员张文德到伪三区担任跑乡，实际任务是由他观察了解打入同志的情况并及时汇报。

由于这些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我们除不断地获得可靠情报外，还依靠这些内线同志的帮助，先后打掉了土山寺、梁庄、军王屯和朱庄四个据点。并采用突袭的办法，打死伪区长王殿明。这对开拓四、五区抗日根据地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敌工部的人员：

敌工部长于化民，于化民同志牺牲后由范辉同志接任。

内勤干事：李贵臣

外勤干事：张宗谦

对敌工作人员：王竹园、李广盈

交通员：李凤禄、陈鲁荣

住聊城宗关敌工干事赵建民。为赵建民同志跑交通的是高振山同志。（赵建民同志已在“文革”期间去世，他发展和领导的工作关系，应由高振山同志另作介绍。）

以上只是记忆所及的一些情况，时隔太久，或有错漏，望同志补正。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聊城县敌、伪、顽据点分部概况

梁金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攻占聊城，当时为国献身的将士有五六百人，还有几百居民殉难，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在此民族存亡之秋，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危害人民。为了永远记住这一血的教训，把当时敌人的组织机构，据点安设的罪恶历史，记录下来，供人们参阅，以便教育后代。

一、聊城城内日伪军政警概况：

1、日军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攻陷聊城的日军是平田联队，约五百人。平田的军衔是少佐（相当少校）。三九年春，平田联队调走，改为千叶旅团，千叶是少将军衔。千叶于三九年三月在鹿场战役被我击毙。以后驻聊城的日军为石川英一联队。〔石川英①是中佐（相当中校）〕，约有三四百人，直到四四年春才调走，聊城仅剩下两个班。

2、绥靖军（即伪治安军）

石川英一联队撤走后，即由绥靖军十七团驻防。驻地在原山东省立二中和山陕会馆。团长为孙××，副团长张建州，约千人左右（四四年古历三月二十七日晚，张在米市街

孔家酱菜园被我武工队李广盈等活捉)。

3、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在聊城有一个班，驻在中华书局（即现聊城地区供销社）。队长是山口勇（上士）。这个宪兵队一九三八年来聊城，一九四四年随石川英一联队一同调走。

4、伪县长、秘书：

一任伪县长李翰章是一九三八年随日军进城来的，秘书为高广月。

二任伪县长陈道衡，一九四一年秋来的，秘书为任××。

三任伪县长袁松言，一九四二年秋调来，秘书为赵建平。

四任伪县长周东华（是日特兼国特），四三年秋调来，秘书赵建平。

五任伪县长石经兰，日寇占聊城后一直任建设科长，一九四五年春提为县长，直至日本投降。秘书仍是赵建平。

5、伪县大队：

从聊城失陷，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张瑞亭，大队副有赵振华、马叶千，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夏（伪大队长由伪县长兼）。伪县大队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由各区乡派丁、派枪组成三个中队。一九四三年，又把各区队改编，加上齐子修残部投日，扩大为十八个中队约一千五百人。一九四五年伪县大队十八个中队集中五处分兵据守。这时伪大队副有：傅崇儒、侯志恩、郭培德、刘云章等形成五个大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掠夺抗战胜利果

实，指派汉奸卖国贼王金祥抢先率入聊城，改编伪军。在城内建立了由国民党军和伪军、残匪合流的“鲁西北保安特务第四旅”近两千人。

6、伪警察局长

日军陷聊后，伪警察局长是王振东。随日本来的特务系长为殷少臣。一九四四年春王振东调走，换局长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王金祥从高唐带来的团长高越南，为警察局长。伪警察局特务系长，一九四四年春换为新铁锋，一直到日本投降。

7、新民会

新民会头目是我妻武雄，职 称是次长，还有一个日本人，名叫井上。我妻武雄可能是一九四四年春，随大批日军一同调走（井上调走还要早些）。

二、聊城失陷后国民党反动派官员变化情况。

1、自聊城失陷到日本投降，以后王金祥进入聊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一直是刘子善，外号刘长腿（日伪期间刘住在聊城东关）。县党部组织科长是张元明、张元庆兄弟俩（聊城城内旧米市街人）。

2、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聊城县长，一九三九年是魏光武，在城西南、城南活动。以后是刘佩之，长期在城北活动。日本投降后，进城的县长是刘金镶，外号刘瞎子，又名刘伯菜。

3、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

沈鸿烈委任当时驻朝城的王金祥为聊城专区专员。一九四二年春，齐子修从黄河南回到聊城以北，驻在聊（聊城）、临（临清）、堂（堂邑）、博（博平）边境，实力比王金祥大，这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穆中杭，又委任齐子修为聊城专员。王金祥在高唐一带住闲。一九四三年夏，日本石川英一扣留齐子修送往济南，全歼齐部后，国民党又委任王金祥为聊城专区专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王金祥由高唐带王兴邦团（五十多人），高越南团（八十多人）来聊城改编伪军。当时国民党委任王金祥为第五绥靖区专员兼第五作战区司令。

王金祥把原驻聊伪军和残匪十八个中队，改编为两个团，番号为山东省保安第四旅。旅长赵振华（上校），副旅长郭培德（上校）兼二团团长。一团团长傅崇儒。王金祥、赵振华、郭培德三个罪魁，在短短的一年内，秘密杀人的数量，超过日本鬼子占领时期，特别是郭培德杀人更多，为恶中之最。

国民党聊城城关区分部，一九四〇年起书记为刘建平，委员有刘金之（管组织），徐伦卿（管宣传），直到聊城解放。

三、日伪顽碉堡，据点的简况

从时间上，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占领聊城县城，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止，将近七年，从地域上讲，不包括解放前的聊城全境（因解放后将聊城东南老三区五十多个村庄划归东阿县），本文所说的范围，是一九五

六年堂邑部分村庄划归聊城后的全部区域；从敌人兵力分布看，全县共一百零六个据点，计日、伪、顽军一万二千六百多人。其中：①、日伪碉堡据点四十个，累计三千多人，百分之八十安设在聊东南、聊南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及其他游击区；②，吴连杰部据点三十三个，三千四百多人，盘踞在堂邑以北斗虎屯一带；③、齐子修部据点三十三个，六千二百多人盘踞在聊西南、聊西北，直至茌（茌平）、聊（聊城）边界。这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把全部武力用来对付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及我游击活动地区，而对顽军则是和平共处。日伪顽三位一体共同对付我抗日军民。同时，也说明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在艰难的抗日岁月中，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敌伪据点被我军陆续拔掉：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全县已为我攻克的大小据点有二十五座。只有王金祥、赵振华、郭培德等残部约二千余人，逃入城内，但亦处于我军控制之下。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我聊城抗日武装未能及时解放城池。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我军围困聊城顽军，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农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终于解放了聊城。

附：聊城日、伪、顽碉堡据点简表

聊城日、伪、顽碉堡据点简况

地 址	安 设 时 间	番 号	人 数	拔 掉 时 间	备 注
双 庙	1941.3	伪	100	1945.4	1.伪警察2.段亭谭浩安等乔装打扮,智擒全敌。
朱老庄	1941.3	伪	15	1943.	
毛 营	1941.3	伪	15	1943.	
老槐阴	1941.3	伪	15	1943.	阳谷三区拔掉的。
谭 庄	1940.3	伪	150	1944.11	汉奸队长傅崇儒住在里边。
韩垌堆	1940.3	伪	15	1944.10	
赵 岗	1940.3	伪	15	1944.	
周 店	1941.5	日伪	150	1944.8	日本鬼子15人,伪军一个中队。
庄 东	1941.5	伪	15	1941.	
姚 庄	1941.5	伪	15	1941.	
魏 庄	1942.10	日伪	180	1944.9	1.日本鬼子30人,伪军一个中队,2.逼出敌人中队长,全部消灭汉奸兵。
马 庄	1942.10	伪	15	1943.3	在马庄村东南,魏庄至周庄封锁沟中间修了三个碉堡,群众叫炮楼。
前高香坊	1941.2	伪	150	1941.10	
王西庄	1941.2	伪	15	1941.3	
刘道之	1939.	伪	100	1944.	
周 庄	1940.8	日伪	100	1944.8	日本鬼子10人,伪乡长罗寿山住在里边。
赵鸭庄	1940.9	伪	30	1941.2	
朱 庄	1940.4	伪	100		侯志恩伪军一个中队

花牛陈	1939.3	日伪	300	1944.11	日本鬼子20人，伪军一个中队，红枪会头子汉奸陈玉怀住在里边。
王官庙	1941.5	伪	150	1941.8	运东大队拔掉的。
军王屯	1940.3	伪	150		1.伪区长王殿明住在里边。2.代伯明、韩学水、杨金玉三人计入虎穴毙豺狼。
陈口	1940.3	伪	15	1944.	
姚庄	1940.3	伪	30	1944.	
庄东边	1940.3	伪	15	1944.	
王虎庙	1941.	伪	15	1942.	我县大队拔掉的。
土山寺	1941.	伪	30		
刘集	1940.2	伪	200	1940.11	三团拔掉的。
梁闸	1942.11	伪	60	1943.12	
堂邑城	1938.12	日伪	700	1945.6	1.日本鬼子50余人。2.我八旅二十二团马河支队，辛朝大队，军区司令赵健民指挥拔掉的。
王堂	1940.3	日伪	200	1943.8	
沙镇	1939.3	日伪	120	1944.6	1.日本鬼子20人。2.三九年春夏曾两次打沙镇一次是徐翼等七人战群狼得枪20支，二次是徐翼等十八勇士打沙镇得枪60支。
侯营	1939.3	伪	50	1944.8	
温集	1940.3	伪	100	1943.	
南北辛庄	1940.3	顽	50	1940.7	吴连杰部王二夜猫住在里边。
后哨营	1938.9	顽	400	1945.5	保安四旅手枪连、吴连杰旅部。

城 棚	1939.9	顽	120	1943.12	吴连杰部
斗虎屯	1939.3	团部	200	1944.2	吴部程团
板桥吴	1938.6	连部	120	1944.2	程团连长高二子
土 岗	1940.4	吴部	130	1944.2	吴部许团副
任香坊	1938.6	营部	200	1944.8	郭牛最凶恶、害家属 杀干部
阎园子	1941.4	连部	120	1943.2	
贾 庄	1939.2	营部	200	1944.2	程团营长李丙贵
乔 集	1939.10	伪	100	1944.6	户队长车××
邢 庄	1940.4	吴部	100	1944.2	营长李丙贵部
许 店	1941.9	吴部	100	1943.12	营长马长林
大王庄	1938.6	吴部	100	1944.8	郭牛部黄连
杨天红	1941.3	吴部	70	1942.11	张连长(张飞庄人)
大袁店	1939.3	团部	300	1944.1	团长黄鲁斋
吴海子	1938.9	吴部	150	1944.9	吴连杰的家
张樊庄	1940.4	吴部	150	1943.5	陈团副
王枣棵	1939.3	吴部	300	1943.5	营长郭自山
官家堡	1939.3	吴部	80	1943.10	连长张登奎

龙王庙	1942.9	吴部	80	1943.11	
小袁庄	1939.3	吴部	120	1943.12	
冯家庙	1940.9	吴部	60		黄鲁斋部一个连
八甲刘	1942.2	吴部	30	1943.1	宋凤岐部
大陶庄	1939.3	吴部	170	1942.8	黄鲁斋部
大蒿庄	1938.4	司令部	1000	1943.12	齐子修在聊边（以下均齐部据点）
南吴寨	1942.5	齐部	70	1944.3	连长罗登奎
梁浅东围子	1941.4	齐部	50	1944.10	团长姜克民
程范庄		先罗后齐	100		在聊边
小蒿庄	1938.4	教导团	300	1943.12	队长龙振东王连吉
白渡口	1939.	副司令部	500	1943.12	副司令部杭洪最凶恶
李回庄		齐部	100		在聊边张占奎住在里边
关 厅		齐部	70	1943.12	在聊边

郑 营	1942.2	齐部	70		
梭 堤	1942.5	齐部	400	1944.	都旅旅部旅长二老部
长什店	1941.4	齐部	80	1944.4	团长姜克民的人
东 关	1942.	齐部	80	1943.8	队长张桂林
陈古庙		齐部	60	1944.2	阎大旺
小营线		齐部	500	1943.2	旅长簿广山抢粮种揭锅断炊烟
尖 庄	1938.2	齐部	50	1939.9	
王 庄	1938.2	齐部	40	1939.9	
小杜庄	1938.2	齐部	50	1939.9	
郝 庄	1938.2	齐部	60	1939.9	
李荆庄	1938.2	齐部	100	1939.9	营长朱文华
柳 庄	1942.2	齐部	20	1943.2	军需魏振山
任 庄	1942.3	顽	100	1943.8	
锦虫庙	1942.6	顽	100	1943.8	
楚 庄	1941.	顽	150	1943.12	郭培德杀人300余,杀牛300头,抢粮20余万斤,烧房300余间。
田 庄	1940.	顽	100	1943.11	
李 海	1939.8	顽	1000	1943.10	邵吉胜旅长和田团

白 堂	1939.8	顽	800	1943.10	邵部的王团
侯 家	1939.8	齐部	200	1943.10	邵吉胜的部队
后 王	1939.8	顽伪	200	1944.	先是邵部罗团，后是 伪军一个中队
五 孙	1941.10	顽	300	1942.4	
小 屯	1941.	顽	70	1941.11	
前 化	1944.2	顽	100	1944.4	王奎一部
后 化	1944.2	顽	100	1944.4	王奎一部
盛 庙		顽			
王尔镇屯		伪			
刘 庙		伪			
道口铺		伪			
张炉集		伪			
李双镇		伪			
朱瓦房		齐部			
五里墩		伪			
谢 家		伪			
十八里堡		伪			

有关聊城县（筑先县）敌情概述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

张宗谦

聊城自古为鲁西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前，为国民党第六区督察专员公署驻地，并常驻一旅之师。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迫使我们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闻风溃退，鲁西北国民党的一些行政官吏惶惶逃遁。唯当时国民党的第六区督察专员范筑先，在我党的帮助下，按照我党“国共团结抗战救亡”的主张，编组军队，刷新政治。我党一些领导同志，以六专署政治部的名义，由秘密活动到公开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范筑先专员就编组了三十五个抗日支队，“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四起。

“抗日必先剿共”等反动言论，被迫消声匿迹。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范筑先将军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政治核心人物，聊城自然也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侵占聊城，范筑先将军死难，第六专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这个变化的主要特点是：由一个在范筑先专员领导下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

面，变成了一个各种政治力量各自为政，经常争高低的混乱局面。日寇侵占聊城后，一面四出扫荡，摧残我抗日力量，同时组织宣抚班随军进行宣传，以瓦解我抗日军民的斗志；一面积极地筹建伪县、区、乡政权，以扩大其占领区域，并建立警察机构和伪军队伍以加强其统治。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由在范筑先时代的“明抗战、暗反共变为不抗战明反共，直至联合、投降日寇共同反共。”各地封建势力和其掌握的反动会道门也起来反对我们，一些土匪也乘机扰乱。彭德怀同志用“敌、伪、顽、会、匪，五鬼闹中华。”一句话对这种混乱形势进行了高度概括。

我们在这个地区，由于失去了范筑先将军那样有影响的能领导其合作进行抗战的人物，特别是在国民党新委任的专员、县长和其领导的军队已明目张胆地进行联日反共的情况下，遂即按照毛主席的“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政权，团结各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领导群众抗击日、顽。

聊城失守后到一九四七年春聊城解放的八年，是我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向敌、伪、顽、会、匪斗争的八年。为纪念回顾我党这一阶段斗争历史的时候，敌、伪、顽、会、匪的情况也是必须述及的。

一、敌人方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日寇以三百余人的兵力进攻聊城县城，十五日聊城失陷。敌占聊城后，根据其军事需要，常有重兵驻扎和经过，但经常驻防的不过一百五十人左

右，是一个大队的一部，其中分出四十余人驻堂邑，十余人常驻周店，十余人常驻花牛陈据点。

二、伪政权与军队

敌人侵占聊城后，即积极地建立伪政权。第一任伪县长是李翰章。一九三九年初，各区、乡的伪政权按原来区划相继建立，待各区、乡伪政权建立后，即积极地向各村派款买枪，组建伪区、乡武装。多则达五、六十人，如王世隆屯乡。少则二、三十人。平均约三十人左右。分别在本区、乡建立据点，以加强其统治力量。

在建立伪区、乡政权及武装的同时，伪县府也积极筹建伪县警备大队。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筹建第一个中队，兵是花钱雇的。由一日本人当指导员，张美亭任为中队长，张瑞亭主持训练。该中队住县政府内。一九四〇年初成立第二中队，中队长吴士超，与第一中队一起训练，这时，宣布伪县长李翰章兼大队长，张瑞亭为大队副，不久调一中队住东关。

一九四〇年夏成立第三中队，中队长高庆云，同年十月间调一中队到周店，一九四一年二月间成立第四中队。第四中队编成后将第二中队调往花牛陈。

一九四一年八月编建第五中队，同时，四中队调驻西候营。

至此，伪县警备大队已扩大到五个中队，共五百余人，加上各伪区、乡队（约计七百余），伪军的总兵力已达一千二百余人。

从上述情况中，看到一个特点是，敌人在建立伪政权后：

即积极的扩大武装。在一个伪区，乡队建成后，就到该区、乡安据点。在每一个伪中队建成后，就将训练时间较长的伪中队，由少数日寇率领调往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安据点。企图用安据点的办法来扩大和巩固敌占区，并在敌占区内尽量地搜刮人力、财力以支持其侵略战争，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三、顽军

对聊城抗战危害最大的是顽军齐子修部。（包括他领导的顽县府，即国民党的县政府，下同）。

齐子修原是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南退时，齐子修带着他那一个连在阳谷县迷魂阵脱离二十九军留在鲁西一带作乱。他们抢沙镇、烧油坊，夺聊城，后窜往武城。

一九三七年十月被范筑先将军收编为第四营。以后便迅速扩大，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改编为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下辖三个团，同年五月又增设特务团。

聊城失守后，国民党新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委任齐子修为保安副司令。王金祥是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一九三九年春节后，即令齐子修部到寿张一带打我八路军。同年六月间在梁山被我军击溃后，即回在、博、聊边境地区收容整编部队（当时有一、二、三、四团及特务团等番号）。一九四〇年冬齐子修因反共有功，手下又有大批人枪，被国民党委任为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齐子修接任新职后，即把他手中掌握的一万多人改编为九个旅，对外号称三万人。

齐子修重回花、博、聊边之后，就有人传他说与日寇进行勾搭并达成了协议，内情虽不详，但从他修筑围寨作屯兵巢穴，丝毫不惧怕日寇的进攻这一点来看，日、齐间的协议之说不是无因的。特别是在齐顽刚立定脚跟就配合日、伪，以步步为营的方法，向我根据地增修据点，这就更进一步证明日、齐协定的存在。大概齐顽还不满足与日寇的这种外部联合，在一九四一年，齐子修部九旅副参谋长王克庄和该旅营长赵振华、朱耀武、付崇鲁等率三百余人投降聊城日军，被编为“鲁西剿共游击第一支队”。由王克庄任司令，下设一、二、三中队，由赵振华、付崇鲁、朱耀武分任各中队长。同年秋后，该部即被派到果子王、柿子园、高围、周庄一带去修筑据点，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就近进攻我抗日军民。

一九四二年春天，又有齐子修部八旅的团长田福州，带其第一、第二两个营（第一营营长李寿朋，第二营营长李顺德），六百余人投敌。同年秋后到我根据地赵庄、魏庄一带修筑据点，田福州部的第三营（营长冯颜新）仍留在聊西李海驻防，并由田福州的老婆指挥。当时田团在聊城设办事处，把在城东南赵庄一带的据点称为前方，把李海称为后方。

以言齐子修部六旅旅长王魁一的团长郭培德也率部一百余人投敌。

齐子修部三次公开投敌的部队共一千余人，这个数量已大大超过敌人亲手培植起来的伪军，加上齐子修万余人在外呼应，这当然会引起日寇的疑忌。约在一九四三年五、六月

间，敌人设计把齐子修骗入城内扣留后，即大举扫荡齐子修的后方。齐部除其特三旅李岐山部早已投降在平敌人，未受打击外，其他武装被消灭殆尽。其七旅薄光三部残存的二百余人，由高耀南率领，于一九四四年投降了日寇，被编为两个伪警备中队。一九四五年春，高耀南又带着两个伪中队投到高唐庞长申部被编为庞部的第十一团。

这时，除原有警备大队第一大队外。（第一大队付是张瑞亭）。日寇将齐子修部投降的伪军，统编成伪警备大队。王克庄部由“鲁西剿共游击支队改编为伪县警备第二大队，由赵振华任第二大队付，田福州团的一营改为第三大队，由该营营长李寿朋任第三大队付。田团二营改编为第四大队，由该营营长李頌德任第四大队付。郭培德部被编为伪警备大队第五大队，由郭培德任第五大队付。另外，尚有赵振华编建的小孩中队，中队长张桂西，归哪个大队不详。这五个大队统受伪大队长管辖。大队长由伪县长兼任，付大队长是马业迁。

抗战中的对敌斗争，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在聊城的武装斗争中，对我们危害最大的则是由齐子修部投降日寇的这部分伪军。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多是反共老手。在抗战前已经和我们在战场上较量过。投敌时又灌输了“曲线救国”反革命思想，所以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不仅不以投降日寇当汉奸为耻，相反，他们却认为这是在敌后扩大势力进行反共的好办法。由于他们有这样的精神支柱，所以对我们作战就表现的非常顽强。我们虽然对他们不断晓以大义也无显著效果。在日寇投降以后，他们就摇身变成国民党军。继续对我

们负隅顽抗，时间竟达一年另四个月之久，事实证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聊城抗日军民危害最大的除日寇之外，就是在国民党“曲线救国”政策欺骗下的这些伪顽军队了。

四、红枪会

抗日战争时期，红枪会对我们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聊城东半部的红枪会，主要分为三大派。一派是陈玉怀、陈万泗，他们以花牛陈为中心。一派是三殿明，以小王庄为中心。另一派陈殿贞以徐田庄为中心，他们每一派都控制着几十个村庄。

陈玉怀一派红枪会，自一九三九年始就反对我们。同年，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梁百合部来这一带活动。陈玉怀把梁部驻地的人员扣住。后又把我先遣大队第一大队长梁百合杀害。为此，我青华支部骑兵团曾给陈玉怀一派红枪会以重伤。后来，陈玉怀投降日寇，当了伪乡长，并组织武装，坚决与我为敌。直至一九四四年秋，陈玉怀盘据多年的花牛陈据点才被我军打掉。

一九四一年，红枪会王殿明，陈殿贞两派都开始活动。这两派之间矛盾很深，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着发展会员，一九四二年闹灾荒的时候，他们各自调动几百名会员，到还没入会的村庄去强迫群众入会。如不入会，几百人就住在那里不走，要村上供给吃的。这样，两派红枪会很快扩散开来，在一、二个月的时间内，便发展到城北冯庄、周堂。往东发展到在平县的邱子张，金家楼一带。两派中，陈殿贞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的行动听从城北孟阎庄本道内

一个“天眼”的话，他当时没与敌伪挂钩。对我们不真正怀有敌意，为此，我们对他采取了拉的政策。由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张侠同志亲自去做陈的工作。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及抗战形势，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和汉奸卖国求荣的罪恶。通过耐心艰苦地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此后，他们的地盘我们常进常出，扩大了我们的活动范围，粉碎了日伪对我们的封锁。但，由于陈殿贞等的反动本性未经改造。他们在敌人的欺骗引诱下先后趋向反动，四六年春，聊城东北孟阎庄的分会高文廷纠集土匪将我五区王队付、通信员杀害。一九四七年陈殿贞在我们组织大参军时封了皇帝、大臣，组织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政权，当即被我政府镇压。

红枪会的总头目王殿明，是个认贼作父的家伙。他一心想依靠敌伪往上爬，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特别麻烦的是：凡是入了王殿明红枪会的村庄，第一是抗缴我们的公粮。第二不让我们去活动。我们给他们讲军民团结起来打日本才能不做亡国奴的道理。他们不听，如果我们真的住下，他们就吹号击鼓扰乱得我们不得安宁。凡是有王殿明那一派红枪会的村庄，对我们都是一个腔调。一个办法。这证明是统一布置的。我们为了避免和红枪会矛盾的激化，就尽量不去有红枪会的村上活动，可是他们又用强迫群众入会的办法往我们的游击区甚至根据地的边缘发展。他们这样一步一步地挤我们，和日寇对我们实行“封锁”、“囚笼”的政策，形成了有机的配合，我们虽采取了种种措施、对王殿明进行教育争取，但王殿明执迷不悟，说：“八路军那几个人又没

好枪，成不了气候。”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起劲地反对我们，经常吹虚他杀了多少八路军。还亲自带领红枪会和伪军一齐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扫荡。一九四四年春天，王殿明当上了伪三区区长，更死心塌地当汉奸走狗，给我们的抗日活动设置了更大的障碍。一九四四年八月间，我抗日政府配合敌工人员，深入军王屯据点，击毙了作恶多端的红枪会头子王殿明，才使我们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迅速得到开展。

五、土匪

日寇侵占聊城不久，城东惯匪刘文焕（人称刘九）就投敌当特务队长。当土匪的陈凤岐投降敌人当了伪乡长。新出现的一些小股土匪孟庆河、谢立基、安成德、豆华如、王庆祥等乘机抢劫民财，危害地方治安。特别是豆华如、王庆祥、安成德一伙，他们和宋家庙的红枪会头子王长清（外号“瞎五”，是王殿明的分会会长）勾结在一起，一次就劫了五辆大车，勒死七个赶大车的，并把尸体埋掉。这些坏家伙还与汉奸陈玉怀暗中勾结，陈玉怀也亲自到宋家庙去活动，企图形成伪、会、匪的大联合。

总之，聊城抗日斗争绝不是单纯地对日寇的斗争，在日寇“以华制华”的毒辣手段下，加上国民党“曲线救国”反动政策的实施和地方一些土匪、会道门头子的反动本性难移，使敌、伪、顽、会、匪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动的营垒。所以，我们聊城民族抗日斗争的胜利，也是我们对会匪顽斗争的胜利。

齐子修与“三支队”简介

翟世荣

（一）三支队演变过程的梗概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闻风而逃。同年十月，在宋哲元二十九军中任连长的齐子修，随溃军南退，在鲁西北一带脱离溃军。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适值范筑先将军奉韩复榘之命撤出聊城之时，齐子修带一连人马（全连有迫击炮二门，轻机枪四挺，士兵百余人，连长齐子修，排长赵中华、齐润泽、邵吉胜，司务长单杭洪，上士薄光三），骗开城门，抢占聊城。但其恐被地方民团消灭，便在城内找到商会会长索要金钱，并抢掠商号、当铺后，当夜撤出聊城。其后又领兵夺沙镇，烧油坊，后流窜武城。不久范筑先将军回聊城，得知齐在武城一带危害地方，亲自前往武城，对齐子修晓以大义，指明出路，拯救齐于迷途。齐子修见范将军虽年近花甲，仍威风凛凛，正气感人，且又语言肯切，心中十分敬服，表示接受改编。范将军遂将齐部改编为保安第四营，委齐子修为营长，赵中华为副营长，邵吉胜、齐润泽等分任各连连长。

一九三八年，范筑先将军为加强抗日力量，先后收编、

组建了三路民军，三十五个抗日游击支队。三八年二月，齐部被编为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并派驻堂邑城南关。委齐子修任司令，土匪出身的张新义为副司令，薄光三为参谋长，张占奎为政治部主任。又设军法处、军械处、军需处等机关，将原来保安四营扩编为一团（齐子修兼团长），又收编了齐殿臣（外号齐大骆驼）为第二团（实一个营，齐殿臣任营长），第三团是在堂邑西南郭庄收编的土匪张自修部（由张自修任团长）。

同年三月间，齐子修奉范筑先专员之命，兵分两路，前往清平驻防。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将国民党山东省第四区专员曾琦所属部队缴械，扩编手枪连为特务营。五月间齐部占领了高唐县城。原驻高唐县城的杂牌军李彩题部北窜，遂得大量人马及军需物资。齐子修还未满足，又将高唐东部范筑先将军委的第四支队王子范逐跑，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并扩编原一团邵吉胜营，赵中华营为一、二团，又将特务营扩编为特务团，委萧长贵（萧大麻子）为特务团团长。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下高唐，齐子修的兵力损失过半，但原建制未变。

同年十一月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齐子修见无人管束，便取消了“三支队”的番号，自称山东省警备司令兼独立十一旅旅长。各团团部改称为警备司令部，八大处长进级为上校处长。同时，派人去石友三部联系。不久，当了国民党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见齐子修兵力较大，为拉拢齐子修，委齐为保安副司令。

一九三九年正月（阴历），茌平被日寇占领。原驻茌平

的布永言部投靠齐子修，被编为第四团。随后，齐子修遵照王金祥的命令，移防寿张县的孙路口、蔡楼一带。五月间布永言的第四团被日军打散，其残部投降阳谷的日军。齐子修又收编了土匪刘洪洲为第四团。六月间，齐部在梁山县前集、后集一带进攻我八路军，被八路军杨勇旅打的丢盔弃甲，第四团被打掉，逃往博平以西范成庄、李四庄一带，整军扩编。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在濮州、范县一带被八路军打垮，齐子修升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收罗残兵败将，将部队扩编为九个旅。四个直属团，八大处（即：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秘书处、译电处）及政治部未变动。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员点验，将九个旅中的特二旅及七、八、九旅（齐子修的嫡系部队）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旅。这时齐子修达到最盛时期，号称三万人马（实际上只万余人）。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设计，将齐子修、各旅参谋长及随行人员骗进聊城扣押（后送济南新华院监禁），遂派重兵到齐部强行收枪，不服收缴者均被击溃，大部投降日军或自行瓦解。同年冬天，副司令单杭洪带司令部所属人员三四百人，在摆渡口被日军俘获。第二年春天，七旅残部，由付旅长高耀南率领投到聊城当汉奸了。至此，妄图称霸鲁西北的齐子修及“三支队”便消声匿迹了。

（二）齐部与日伪军之关系

齐子修被委任为国民党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后，便把

改编的九个旅分别驻扎在聊城、冠县、茌平、博平、清平的边缘地带。此时，人传齐部已与日伪勾结并达成秘密协议。虽然秘密协议的具体内容不被世人所知，但从他修筑围寨作为屯集巢穴，逐步向我抗日根据地蚕食，与日伪却能相安无事这点来看，日、齐秘密协议之说，不无根据。

一九四一年齐部九旅付参谋长王克庄率该旅营长赵振华、朱耀武、付崇儒等三百余人投降驻聊日军，被编为“鲁西剿共游击第一大队”。此后，齐部特四旅旅长李岐三亦率部投了茌平日军，并充任伪茌平县长。齐部八旅的团长田福州，带该团一、二两营（约六百人）投降了日军，被派往聊城东南赵庄、魏庄我抗日根据地驻扎。后又有四旅旅长赵廷柱（驻清平马厂），五旅旅长沈凤午（清平于坡），特一旅团长徐冠五（驻博平蔡屯）、六旅郭培德部队相继投敌当了汉奸。一九四四年春七旅付旅长高耀南也投靠了敌人。他们既是伪军的大队长或中队长，又是齐部的旅长或团长，既听齐子修指挥，又听日本人调遣，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后齐部在聊城城内设了办事处（处长李敬坡），公开地投靠日寇。日寇深知齐的用心，便设计将齐等扣押，并派兵扫荡齐后方大本营，捏断了根，这些齐部的所谓“两面人”便死心塌地当汉奸卖国贼了。

据不完全统计，齐部先后投降日寇三千余人。带这些人投敌的头子多是反共老手，投敌时又灌输了国民党的“曲线救国”的反动思想，一些骨干分子并不以为当汉奸为耻。由于他们有反动思想为精神支柱，所以在对我们的作战当中十分顽强，危害极大。

(三) 齐部的国民党组织

一九三八年初建“三支队”时设政治部。该部主任张占鳌是国民党顽固分子。他的下属工作人员多系国民党员（大部是聊城东北孟营一带人）。后齐部迅速扩编，各旅均设政治部，由国民党员任政治主任或工作人员。

张占鳌是聊三师毕业的学生。他与曾任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书记长（后升为国民党山东省鲁西党务办事处的督导员）的田谊民，国民党聊城县党部的书记长刘子善（又名刘延庆）关系甚密。他在三支队的政治部工作部门发展了不少国民党员，并成立了国民党区分部。这个区分部就成了“三支队”中政治工作的中心。

一九四二年秋天，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书记长刘子善和党部干事詹剑鸣到沙镇一带郭培德的驻地，发展了郭培德、王觉民、王恩卿、郭培显等人为国民党员。随即由刘子善主持成立了以郭培德为书记的国民党区分部。

一九四三年初，齐子修曾委任刘子善为团长、詹剑鸣为付团长，要其拉队伍，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区分部建立以后，田谊民、刘子善等经常到齐部活动，主持召开区分部会议，要求以区分部的名义，大量吸收党员。并指示在伪军中的国民党员不能辞职，还鼓动国民党员积极参加伪组织，大搞反动的“曲线救国”。

(四) 齐部的“铁血救国团”

“铁血救国团”是齐子修的政治部主任张占鳌、军械处

长盛英翰等国民党顽固分子鼓动齐子修建立起来的。它按照国民党的建党方式而建，以齐部骨干分子为对象，在名义上对外讲抗日救国，对内讲维护齐部的团体利益。

一九四二年春，在博平西李四庄的礼拜寺，召开了“铁血救国团”的成立大会。由军械处长盛英翰主持并发表讲演。齐子修及“三支队”的主要头目都参加了大会。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均是校官以上官衔的，每人发一兰皮的团证，上有姓名、年龄、籍贯、誓言等栏目。入团者均按栏目填写清楚。该团的团长是齐子修，付团长是齐子修的参谋长薄光三。

“铁血救国团”实质上是被国民党顽固派操纵的一个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团体。

（五）齐部中的单氏兄弟

齐部在鲁西北一带站稳脚跟后，即对百姓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以充军资，肥己私囊，并不断派兵充匪，打家劫舍。一些没有势力的富豪之家所属金银珠宝均被抢劫一空。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大灾荒，齐部不顾百姓死活，照常征收钱粮，以致造成鲁北无人区。“三支队”的官员们却大发国难财，单氏兄弟就是一例。

单杭洪，河北玉田县入，商人出身，原在二十九军时是齐子修连的司务长，与齐等结为盟好，关系甚密。后齐子修升任国民党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便委任为副司令，并兼军需处长，特一旅旅长之职。征收的钱粮全经单杭洪之手，其入私囊者不计其数。他用这些钱财，在济南购置住宅小楼

一座，娶一京剧旦角为妾，并开石印馆一处，由堂邑荣某人当经理。此外，下属人员，投其所好，以金银饰物相赠者不绝，可谓暴发矣！

其弟单子良，初来齐部时跟齐子修当勤务兵，后因其哥单杭洪的门路，不断被授予重任，直至骑兵团长，特务旅旅长，独霸一方，欺压百姓，威势赫赫，后娶一妻两妾，生活糜烂无度。

齐子修简介

齐子修（生卒年不详），河北固安县人，自幼当兵。曾在长城附近张家口一带为匪。后投石友三、冯寿彭（冯二皮）部当兵。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齐任宋哲元二十九军的连长。齐虽兵痞出身，但心机灵敏，处世狡诈，野心勃勃。

齐子修在家行四，齐的司令部住梁水镇董庄之时，他的父亲、兄弟均来住过，其中一个称“三大人”的帮齐处理军机，虽无明确职务，却独擅威权，以维护齐子修的地位。其余几人，或在街面收税，或闲住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者亦有之。

齐原有一赵姓太太（人称大太太），后在清平城内又续娶了王善堂部（范筑先委任的支队司令）的参谋长柴孟笔之女为二太太，以加强与王善堂部的联系，扩大势力。

齐子修及“三支队”在鲁西北经营六年，勾结日伪，扰害百姓，与我抗日政府为敌，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伪顽刘（中孚）团的形成和复灭

张宗训口述

张思俊整理

张 炬供稿

刘中孚团的形成和复灭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刘在康营驻防被八路军消灭的前后

刘怀玉，号中孚，在抗战前夕是国民党“西安警官学校”的学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被派回到原籍堂邑县张炉集（现聊城县张炉集），随之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四区临清专员袁聘之的第二十二旅第三团团长职务。日军侵占华北后，于一九三八年两次侵入临清，袁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领第二十二旅的亲信部分部队，弃城南逃。刘怀玉乘此机会，带领残部，一百余人窜入堂邑县城南一带活动。一九三九年腊月末（一九四〇年的一、二月间），驻防康营。因反共扰民严重，民愤极大，被八路军一举歼灭。刘右臂受伤，藏匿起来，未被抓获，团部的主要人员均做俘虏，其中有军需主任张宗训，军需刘怀岭，营长冯维新，连长程梦魁，以及贾书玉、张洪昌和堂邑的苗桂华，侯家的侯树刚。刘负伤后藏在原聊城县孙庄他二哥的岳父家养伤，半年后全

愈。

二、投靠齐子修(三支队)前后

一九四〇年夏末，刘伤愈后，由程梦魁陪同去后程庄策划重整旗鼓，在中途被齐部团长“二老单”（名不祥）截获，当即押送齐司令部。齐子修素知刘与己同类，为伪顽杂势力，但恐刘不忠于己而叫刘取得堂邑城南一带联村保伏后，委任刘为齐云泽旅（老齐二侄）第二十八团团长职务。刘继而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并先后驻防蒋庄、花园等据点，人员扩展到四百多人。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刘率齐部调到在平县城南一带驻防，并改编为第二十六团，兵员增至五百多人。不久，日（军）齐（子修）矛盾，日寇突然集合日伪军重兵将齐部包围，未经激战，齐部即大部溃散（按：此时应是日寇威逼齐顽军改编为日伪军之时，此后齐部即为两面派军队，继续发展，成为我军民抗日之劲敌）。这时刘团乘机带原部亲信官兵三百余人，撤回堂邑城南老巢。随之建据点“谢家围子”并积极投靠堂邑县的日军，脱离齐部。日军委任刘为堂邑县第一、二、三区人民自卫团团长职务，冯维新任一营长，魏黑子任二营长（此二人均系改编土匪头目），李令杰（后石槽人）任三营长，邱泽民、王永安任团副，程梦魁、刘怀岭任连长，暂驻蒋庄、苏庄、花园等据点，当年秋季，刘为扩充其势力范围，先后建设起范庄、后田家、白周家等据点。这样就和谢家形成了由东至西约三十华里的据点群，兵员扩充到八百余人，控制着堂邑县城南、城西的大部分地区。时是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

罕见的灾荒年，刘的经费除少数由日伪供给外，大部靠抢劫人民的粮食和财物维持。一九四三年秋，日军察觉刘不听从调遣，怀疑刘有“反日阴谋”活动，随之发动重兵，以清点人数为名，将刘团全部缴械，兵员除少数当了伪军，大部溃散（约七百余入）。刘带其亲信逃至异地，同年初冬去济南，稍后去南京。经过刘在警官学校时的教官陈允文（任伪高级军官）的活动，担任了汪精卫的警官学校总队长职务。随刘同去的有张宗训、李动桥（后石槽人）、王文安、李炳雨。

三、抗日胜利后的刘中孚及其伙伴

经过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投降，重庆国民党派员去南京接收，因刘是汪精卫的部下，被排斥，不予接收。刘倒台后去洛阳投其同学（姓名不详），半年后，经此同学介绍和重庆在南京的国民党接收要员取得了联系。经过种种手法，取得了该要员的信任，并搞到“委任状”，任河北省井陘县警察局长职务。刘这时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官员，于一九四六年由南京去上海乘船到天津（因津浦路大部为解放军控制），经北京去河北省井陘县就任。程梦魁随去任县自卫总队长职务，张宗训任总务科科长职务（张暂留北京，始终未到任）。一九四七年井陘解放，刘在解放井陘的战斗中失踪，至今无信。程梦魁于井陘解放后逃往北京，后去山西省山区，至今也无信息。

回忆父亲——赵以政烈士

——纪念先父赵以政烈士牺牲

五十五周年

赵 焱

爱国本无罪 革命更无辜

死所何所惧 我径仰天呼

先父赵以政烈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壮烈牺牲已经五十五周年了。回想往事，思绪万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父亲就义时，只有二十四岁，那时我才四岁，对于父亲之死，可以说一无所知，懂事以后，祖父和叔父们不断为我讲述父亲生前的革命理想、事迹和壮烈牺牲的情景；母亲也总是教育我要努力读书，学好本领，长大后好为父亲报仇；父亲生前的战友们，也经常给我来信，回忆当年他们和父亲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鼓励我继承父志。在这些教导下，我从十三岁（一九三七年）就投身革命，立志为人民、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为了鞭策自己，为了教育后代，现在将我所知有关父亲的事迹，记述于下：

追 求 真 理 走 向 革 命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列强入侵；建立民国后，袁世凯卖国求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这暗无天日的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革命的曙光。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五四”运动爆发了。爱国的革命青年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爱国反帝运动。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希望。当时聊城是鲁西十几个县的文化政治中心。这里有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各地的青年学生都来此读书。他们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如饥似渴地寻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全国学生运动。

父亲和二叔赵以凯，自幼跟祖父在家读私塾（祖父赵子芳是清朝末年的童生，设馆教书）。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祖父先把他兄弟二人送入省立三师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省立第二中学学习。在中学读书期间，他们看了共产党办的《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很受启发。为了探求真理，一些进步学生自动组织起研究会。一九二五年，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五卅”惨案和青岛纱厂罢工运动，组织上街游行。父亲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带头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他们自编自演文明戏，搞街头活报化装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惨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些爱

国活动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

由于南方革命形势高潮的影响，父亲于一九二五年初中学毕业后，决心投笔从戎，他和同学王寅生（阳谷人）、聂子政、孙大贵（莘县人）、宋占一等人，徒步到邯郸乘火车到开封，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在校期间，他们聆听了周总理和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邓代英等人的教诲，受到很大影响。毕业后父亲于一九二六年被分配到第三路军朱培德部任排长。在东征江西的路上，由王寅生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北伐时，父亲很快就由排长升为营副。到汉口时，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忍痛交械，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父亲坚决和反动派作斗争，在党的营救下出狱，后经中央军委以军事特派员身份派回山东作地下工作。

披荆斩棘排除万难

创立中共鲁西县委

根据母亲生前的回忆，父亲是一九二七年阴历六月从济南回家的。回家后就忙于工作和学习。为了便于和群众取得联系，他经常睡在场院窝棚里。秋收以后，来往我家的人就更多了，有时农民也来，都是在祖父教书屋里间谈话开会。祖父虽对父亲行迹怀疑，但相信儿子的为人，绝不会干什么坏事。有时父亲主动讲些国内外的形势，把“四·一二”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罪

恶行为和共产党决心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等，讲给全家听。祖父曾问父亲是否共产党，父亲笑而不答。这时老人已经知道父亲八成是共产党了，因此常告诫他的学友们要注意行动。

一九二七年十月，张干民同志奉省委指示，来聊城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就在我祖父教书屋里间和父亲接上关系。张干民传达了省委指示，父亲十分高兴，立即通知王寅生、聂子政和袁果到我家来开会。会上，张干民宣部了省委关于成立鲁西县委的决定，由省委指定张干民同志为书记、赵以政、聂子政、袁果为委员。县委机关就设在我家后南屋里（据王筱湖同志告诉我，成立鲁西县委那天，他也列席参加会议。代号为范昌贤人民，取东昌府的意思。）鲁西地区有了党的领导，从此走上新的开端，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父亲除担任县委组织工作外，白天经常去二中、三师做学生工作。有时还到袁楼和周家店去了解情况，自己写稿子，刻钢板，油印文件。王筱湖同志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回答：

“工作忙呀！”仍继续工作着。

鲁西县委成立以后，不久就由三十多个党员发展到一百多个党员，二三百个共青团员。聊城、博平、莘县、阳谷、二中和三师都建立了党团支部。凡有农村支部的地方也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展向地主借粮、借房、抗捐、抗税的斗争。学校组织学生会，宣传蒋介石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罪行。

就在鲁西县委成立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在聊城宋堤口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们勾结地主武装和军阀孙良诚反

动势力，抢先进入聊城，这样斗争更复杂了。

自县委设在我家，来往人员每天增加不少。祖父虽以教书做掩护，老人家总是考虑他们的安全，建议父亲另找一个地方，以避人耳目。后经县委研究，决定搬到北花园（地名）傅老九家（傅状元的直系，当时官府对有功名的官宦之家不敢轻动）。傅家母子俩，只有几间房，一个小院，来往人多了，很快就引起官府重视，警察曾以查户口为名去了几趟。一天张廷焕拿了国民党内部有关情报给县委，当时县委考虑机关已经暴露，必须转移。父亲建议还是回到桃园我家，县委经研究同意了。（张廷焕以后入了党，成为我党的交通员。）

组织农民起义

点燃革命火种

一九二八年鲁西的形势是：新旧军阀忙于占领地盘，内战不休；封建会道门利用大刀会、红枪会群起设坛；一部分农民树起了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旗号；地主在农村也搞什么自卫团，真是珠目混杂，真假难分。省委根据这时我党已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指示鲁西可以乘机搞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据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说：当时县委选择两个点，一是博平袁楼，那里农民条件好，但暴动起来影响不大；一是阳谷坡里，坡里有一个外国人办的教堂，住有外国神父和修女多人。教堂有土地千顷，储藏大量粮食，并有武装教民保护（据说有机枪），如果有一定武装配合农会，就

有把握攻下。当时正好有一小股绿林武装，约有百人，钢枪几十条，号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领头人是韩建德，农民出身，很讲义气。县委决定派杨一斋（共产党员）以亲戚关系去做韩的工作。经过说服，韩愿联合。父亲就亲自到九都松找韩谈判。经过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韩愿意跟共产党干。韩问：“哪里去找共产党？”父亲回答：“我就是代表共产党和你谈判的”，韩当时很高兴。随后县委研究认为具备了暴动条件，即报省委批准，决定腊月三十（农历属一九二七年），乘老百姓过年出入教堂不备，一鼓作气占领教堂，解除其武装。但韩建德性情过急，迫不及待地要提前下手，聂子政劝说不听，不得已只好组织农会会员与韩一起于腊月二十二攻占了坡里，关押了全部德国神父和修女。县委即时出了布告，印发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告人民书”；成立了指挥部，准备同来犯之敌战斗。同时开仓放粮。开始老百姓和教民还有些害怕，通过揭露帝国主义教会与地方封建地主勾结共同剥削贫苦人民的罪行，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后，群众情绪才安定下来。从开始不敢领粮到排长队领粮，真是热火朝天。

坡里暴动不仅震动了东昌府道尹陆春元，而且吓坏了山东省封建军阀。因为坡里洋人的安危对他们有直接关系，所以下令速对坡里围攻。几经战斗，未能攻下，敌人就要求谈判解决——实际是诱降。我党为了保存实力，研究突围，采用边谈判边打的办法，拖到农历正月十三日乘敌不备突围出去。当时突围出去的有二三百人，武器多是大刀和红缨枪。左右有追兵，前有地主民团阻击下打到冠县。韩建德的队伍

损失很大，后来韩本人逃到天津，另谋生活去了。

坡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却在鲁西广大人民心中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人民受到一次革命的检阅，革命的红旗牢牢地插在鲁西人民的心上。

坡里暴动不仅吓坏了反动派，他们对人民革命力量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要消灭共产党，而且也吓坏了党内动摇分子。县委委员之一的哈相越叛变了。他带了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名单向国民党聊城县党部告了密。党的机关也暴露了，反动派加紧了对花园子街侦察，阴谋一网打尽。

忠于党的事业临危不惧

爱同志比关心自己为重

坡里暴动失败后，张于民同志调回省委，父亲代理县委书记。由于出了哈相越叛变，党的机关已经暴露，形势十分紧张。经省委批准，县委机关转移到博平袁楼。五月下旬，博民袁果、郭庆江等人乘夜晚偷偷地把油印机和文件等搬走了，父亲留在家接待同志，到六月初，国民党县党部王慕桥等人在我家前后轮流放哨。祖父发觉后就催父亲快走。父亲说：“事情没完，怎么能走呢！”祖父见劝说无效，又让我母亲劝他。母亲恳求地对父亲说：“你赶快走吧！有人来，我替你接待。”父亲劝慰地说：“不要怕，没事。晚上我在房上睡，一有动静就跳墙出去。”父亲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象平时一样冷静沉着。被捕前一天，王慕桥穿着灰色大褂来到我家。父亲问他：“你来干什么？”王慕桥皮笑肉不笑地

说：“那里，哪里。”灰溜溜地走了。当天下午郝庆江又来我家，要我父亲迅速转移到袁楼去。父亲严肃地对他说：“我还有事，不能走。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很危险。”

六月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头子王慕桥一伙十多人，荷枪实弹闯入我家，名之曰：“请赵先生到城里党部谈谈。”父亲说：“我和你们党部有什么联系？要抓人等我穿好衣服跟你们去就是了。”于是叫我母亲拿出他学生时候穿的鱼白大褂和从南方带来的草帽，从容不迫地和全家人告别了。在此同时，他们把我祖父也押进了城。

针锋相对，坚贞不屈

慷慨陈辞，壮烈就义

父亲被关在“鲁西剿匪司令部”内，祖父另外押着。敌人先提审祖父，问道：“你知道你儿子犯什么罪吗？”祖父答：“我儿子一贯爱国，对人诚恳，不会干什么犯法的事。”又问：“你儿子是共产党，你知道吗？”祖父回答：“我只管教书，什么党都不知道。”又问：“你家那些来往的人不都是共产党吗？”祖父答：“学友来往就叫共产党吗？那就不懂了。邻居串串门也可能是共产党了。共产党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你们说呢！”又问：“到你家来的人，你都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家住那里？”祖父回答：“来我家的是以政、以凯的同学好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家住那里，我只管忙着教书，从来不过问。但我从他们的长相、言谈来看，都是有学问的人。反动派在老

人身上捞不到油水，只好让取保释放了。（祖父生前的回忆）

由于哈相越的叛变，反动派知道了父亲是鲁西县委主要领导人。他们高兴得发狂，以为这下就可以把鲁西共产党抓尽杀绝了。他们先用劝降的办法，出场审问的是刘修民，他利用和父亲是同学的关系，假惺惺地说：“以政同学，你很有才干，可惜误入歧途。现在回头不晚，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马上可以释放，还可以做官。”父亲藐视地说：“你才走入了歧途！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人类光明大道，绝不是歧途！现在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右派，外向帝国主义屈服，内对军阀妥协，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给他们做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无辜的百姓……。”父亲越说越激昂，随即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反动派软化政策失败后，转而采用了严刑拷问的惨酷手段，用蜡烧，用香火烤，拷打，灌凉水，但这一切都丝毫动摇不了父亲的坚定意志。父亲血迹斑斑地站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连在场的刽子手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铜强铁汉，更无法理解这种无畏的革命精神。

父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在我叔父最后一次送饭时，嘱咐他说：“你们要好好照顾父母，不要为我伤心。要好好读书，将来参加革命。要你嫂子带好孩子，长大后继承我的遗志，我就含笑瞑目了。”父亲临死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希望后代继续革命。他用手指在墙壁上刻下了：“爱国本无罪，革命更无罪，死刑何所惧，我径仰天呼。”的壮烈

诗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天空乌云笼罩，父亲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兵士押往聊城南门外大堤。他昂首阔步，面不改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迎着敌人的罪恶子弹，英勇牺牲了。

一人倒下去，全家站起来 继承烈士志，誓死干革命

父亲虽然死了，而他的不朽业迹，犹昭示于人间。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思想仍放射着万丈光芒，照耀着人们继续前进！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他激励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也激励着我的全家。

父亲死后，我家的处境，日益险恶，生活日益困难。但全家并没有因此而丧失革命信心。祖父赵子芳，为革命事业两次被捕入狱，在敌人恐吓审问，严刑拷打下，丝毫没有吐露真情。他教育子孙后代，要继承父兄遗志，完成革命大业。二叔赵以凯，于一九二六年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一九二八年病故于广州（据张千民同志证明，当时他已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叔赵以唐，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〇年由柴龙同志介绍入党，同年牺牲。四叔赵以彭（改名赵建民），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解放前，先后任冀南民先总部组织部长、冀南行署干部科长；解放后，先后任聊城城关区区长、县民政科科长，后调平原省党校。一九五二年调华北局组织部，一九五六年任河

北省艺术学院人事处处长、党委付书记等职。“文革”中含冤而死。我在党的培养下长大成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四〇年入党，一直在一一五师所属部队工作。我爱人田杰、女儿秋云都在各自岗位上为“四化”工作。

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根本的变化。打倒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我们的党更加团结，力量更加强大了，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拨正了航向，排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朝着光辉的二〇〇〇年阔步前进！

千百万为党和革命事业牺牲的先烈们，可以告慰您在天之灵：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您可含笑九泉，死而瞑目了。

宋占一烈士史略

张矩供稿

宋占一烈士，字魁甫，山东聊城县张炉集公社张庄大队人，一九〇七年十月二日（阴历九月初四）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九岁丧父，依其母张氏和哥哥宋魁一，姐姐香莲共同生活。一九二一年和田庄高氏女结婚，不久高氏夭亡，（在占一烈士就义前），没有留下一个儿女。

占一烈士童年时期，曾在邻村宋关庙读过一段私塾，不久改入初级小学。一九二〇年春到聊城升入东临道立模范高等小学，当时学生中有一个讲演会的组织，他被选为会长，常以“爱国”两字命题，来启发同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不保，身家安宅”？这是他贯为引用的两句话。一九二二年冬高小毕业，一九二三年升入山东省旧制第三师范学校，由于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他参加了反帝爱国活动，同时参加了反帝爱国十人团，和国民党反动派地下组织右派势力，经常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聊城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县组织——鲁西县委，在农民和学生中发展了三十多个党团员。三师学生宋占一、张廷焕等人都在这个时期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

鲁西县委在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农历腊月十二日），发动了著名的阳谷县坡里农民武装起义，占领了德国帝国主义在强占胶州湾前已安置下的重要侵略据点——坡里天主教，建立起鲁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省委委员王宣庄、县委书记张干民都曾亲自到现场指挥。起义前夕，省委领导和一部分起义农民共二十余人，携带土枪、土炮，秘密到宋占一家里集中。经过酝酿、准备与布置，直接奔向预定攻占的目标——坡里教堂。宋占一在这次起义军领导机构中，负责宣传工作，并参与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在聊城大量印发，扩大了党的革命影响。

起义军占领坡里后，立刻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宋占一慷慨激昂地讲了话，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山东督军兼直鲁联军总司令）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恶行为，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接着开仓放粮，并扩大革命武装，很快由二三十人的基干队伍，发展到三百人左右。声势浩大的坡里农民武装起义，震撼了山东的反动统治者，聊城的东昌府道尹陆春元，镇守使楼和清，因起义军捕获了一个德国神父和五个德国修女，害怕酿成新的“巨野教案”，一面调来豪绅把持的地方民团和县警备队，将坡里起义武装团团围住；一面派人 and 起义军进行谈判；最后又调来张宗昌的一个守备旅。在敌众我寡的险恶情况下，起义军于二月七日趁刮着大风的夜晚，带着俘获的三个德国人和部分恶霸地主突围，向西北方向转移。行至冠县境内，又遇到直隶军阀褚玉璞的部队，发生了遭遇战，起义武装遭受严

重损失，坡里暴动遂告失败。

宋占一在冠县战斗失利后，回到家乡，路经老贾庄，在他舅父家里躲了几天，后潜赴聊城城内光徽楼东福庆杂货店向俊如处（向系他幼年的朋友），不久即赴济南。

到济南后，宋占一在省委宣传部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一次受到破坏。十二月份，由于党内叛徒王复员、王天兰，投靠了国民党“清共队”，使省委书记邓恩铭、朱霄、纪子瑞、高一梦、宋占一等十二人，同时在省委宣传机关被捕，囚禁在济南普利门外山东省第一监狱。

一九二九年军阀陈调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七月九日，宋占一在监狱里参加了邓恩铭组织的第一次越狱斗争。因为组织工作做得不充分，十九人越狱，除一人获得自由外，其余又被捕入狱（按此人是现任河北省委书记杨一辰同志——金乡人）。宋占一在狱中，屡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和一同蒙难的同志，互相关怀，团结友爱，进行政治文化学习，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为了要求改善待遇，争取自由，他参加了以邓恩铭为首的狱中党组织领导的两次绝食斗争，都获得了胜利。

一九三〇年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越狱斗争。由于客观上的原因，除七人逃出外，邓恩铭、宋占一等十二个人不幸又被捕回，宋占一的舅父张镇西和胞兄宋魁一等人，曾多次前往探监，并设法营救。他舅父还聘请了一位寓居济南竹杆巷的律师邢景白（聊城梁山镇人）为他辩护，这些行动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结果被判处死

刑，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

宋占一同志在敌人法庭上，也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在一次开庭审讯，宣布罪状时，他从容不迫，义正词严地向法官厉声抗议道：“卖国者有功，爱国者获罪，你们执行的是什么法律，还有公理吗？”弄得法官当场膛目结舌。在狱中，他曾给舅父写过两封信，信中说：我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为追求真理的实现，将用尽毕生的心血。还引用了鲁迅的名句：路是走出来的。要舅父劝慰他老母不要为他的吉凶忧虑，并要向老母解说：“民族生命重于个人生命”的道理。这些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政治节操。

军阀韩复榘为了讨好蒋介石，进一步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通过当时的“山东省军法会审委员会”（注一）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在济南纬八路南首刑场，将两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刘寅初和其他省委机关重要干部李子衡、朱霄、纪子云、雷普生、朱山甫、宋占一等执行枪决。临刑前，他们视死如归，面不改色的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当时国民党主办，反动报纸——山东民国日报，在诸先烈殉难的那一天，也不得默默承认，暗自赞叹。（注二）

宋占一就义时，其舅父正在济南看病，闻讯赶赴现场，将烈士遗体就近备棺掩埋，并付以临时碑誌。一九三三年二月间，由其胞兄宋一魁将烈士遗体启运回籍，葬于本村东南坟地（现仍在北）。

宋占一烈士殉难的史事，一九三一年的红旗杂志上曾有过的简略的记载。一九五二年左右，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给宋

占一烈士的胞兄宋魁一来过一封信，叙述了这件事。

关于宋占一烈士生前的党内职务，据：在山东高等法院检察处的起诉书上，和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上看，以及各次公告上，都认定宋占一是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

注一：宋占一烈士殉难前夕，经过一个临时组织的所谓“山东省军法会审委员会”提讯了几次。委员会的成员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张苇村，高等法院院长吴贞×，山东省政府代表（省府参议）李天翼，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李义尘，济南市长闻承烈，张苇村为委员长。最后判决就是由这个反动组织公开宣布的。

注二：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山东民国日报，在第一版用头号标题：“××首领宋占一等十二人一律执行枪决，临刑前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思想中毒之深，概可想见’”。

王晋亭烈士生平简介

1913——1942

李士钊

王晋亭同志，原名连级，号晋三。抗日战争以后改名晋亭。公元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原堂邑县（今属聊城）梁水镇区冯段王庄一个中农家中。七岁后在本村读私塾，一九二七年春天，进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读初小三年级，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二七年秋天，隔着初小四年级，越级升入高等小学一年级。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个歌谣：“王连级，大第一，隔着初四跳高一”，就是指的他能够刻苦努力，发愤读书的故事而来。根据王晋亭同志五十五年前在高等小学时代一位级任教师，八十二岁的程继曾先生回忆：“王连级同学性格爽直，坚忍能干，持身稳重，不苟言笑。他在三师附小时，虽然还是少年，但他具有独立自尊和苦干的学习精神，大有老成干练的成人风度。他对待事物，总是爱凝视，从不轻举妄动。因此他在练习讲演时，常常说得恳切动人，博得与会同学们的好评。由于他有个眼睛偏枯，观察东西时，多半用一支眼睛着力，在凝视的时候，两个眼睛的表情也不相同。同学们见了常常跟他开玩笑，他

都一笑置之，从来不予反击。这正是他不苟言笑的最具体的表现。”

王晋亭同志一九二九年夏天高小毕业后，因为聊城在内战中为土匪所占据，而没能升中学，曾在本庄小学教书，并在家复习了一年。一九三〇年秋天，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初级部（即前期师范），这个学校在大革命时期，是鲁西地区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鲁西（中心）县委成立之前，地下革命组织曾在这个学校中，先后发展了三十多个党团员，并且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有的人参加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著名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起义。同时这里的教师和学生中，国民党反动派分子也相当活跃。其中包括有国民党右派“大同盟”，汪精卫的“改组派”，也有蒋介石的嫡系“复兴社”特务分子，因而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是相当复杂的，王晋亭同志生活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使他有机会在政治上受到很好的锻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这里的爱国学生掀起响应全国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的爱国运动。结果因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而中止了。一九三二年春天，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和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两校发生了革命师生受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搜捕的事件，使聊城两所省立中学的进步学生，在政治上也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九三二年冬天到一九三三年春天，这个学校内的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发动并领导了聊城城内推水工人要求增资的罢工运动，虽然没能掀起有组织的群众性革命行动，但在酝酿过程中，使多数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受到很大

冲击和影响。王晋亭同志因在校爱读社会科学书籍，并关心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他能够而且善于团结进步同学，并能帮助大家共同进步，他实际上成为这个学校进步学生的团结中心，而且他也得到学校地下革命组织的关怀，由于他满怀着倾向革命的强烈政治要求，当一九三四年夏天，在济南参加过反动政府强加于学生的法西斯教育“高中暑期学生军事训练”回到聊城之后不久，经徐运北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使他有更进一步地投身地下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春天，聊城三师成立了以盛北光同志任书记，钱杰东同志任宣传委员，王晋亭同志担任组织委员，新的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他们在学校利用“拜盟兄弟”的方式，广泛团结了进步同学，进而发展党的组织，因而使党的发展进度很快。同时也同学校中的国民党复兴社特务集团的教师和学生，开展针锋相对和不懈地政治斗争。为此他在校内受到国民党特务“职业学生”的跟踪密报，反动的学校当局的极端注视：一九三五年暑假前，王晋亭同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政治威吓，以后又被勒令退学。他被迫离开聊城师范后，却从不灰心，仍继续坚持在校外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先后在冠县农村，在馆陶县房儿寨高级小学和拐渠小学等处，担任高级小学教师工作。特别在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以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时期，努力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使得不少青少年，后来都成为革命战士，踊跃地参加了反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晋亭同志曾在堂邑梁

水镇一带，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先后把本村和邻村地主家“保家护院”的枪支收缴了来，交给由延安中共中央派来山东的老红军干部洪涛同志，支援他们在凤凰集一带新创立党的抗日武装“抗日第一游击大队”，这个部队以后发展为“廖队”，“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机枪营”，并成立为党的基本武装“第十支队”和“筑先纵队”的前身。

王晋亭同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后，在赵健民同志任书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担任党的“巡视员”工作，其公开的身分，是范筑先将军部下政治处的“服务员”，他经常被派到各县去了解党的发展与活动情况，有时还深入各部队（包括反动部队）去做深入地调查研究工作。一九三八年年初，担任改组后洪涛同志任书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部长，在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分工负责鲁西北工作的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一九〇八——一九六七，河北南宫人）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党的机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攻占聊城之后，王晋亭继续坚持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工作，他担任了以张炳元同志为书记的，鲁西北地委第一任组织部长。一九三九年春天，成立了以张霖之同志为书记的中共鲁西区党委，他又担任鲁西区党委三地委组织部长。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改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党校教务主任，先后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革命干部，因为他一贯地对人热情诚恳，任劳任怨，办事认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同志们和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特别能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毛主席著作，办事坚持党的政策原则，从不徇私，忠诚党的教

育事业，在任何时间，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在任何场合下，对反革命敌人，都进行不协调的斗争，为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晋亭同志，一九四〇年冬天，调到黄河以东的大峰山地区，担任泰西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那时济南泰安两地的日寇，对泰西地区不断地进行扫荡，政治环境比较艰苦。他能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满怀政治热情，深入敌人占领区活动，做到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一九四二年三月间，有个泰安的县委书记邹××被捕后叛变投敌，使得泰安的形势，变得非常紧张恶劣。王晋亭同志，这时在大峰山地区召开泰安、宁阳、肥城、峰山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鲁西区党委工作会议和组织会议的精神，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文件。开会的地点在肥城西北山区“峰山县”的岚峪村（现属长清县）。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在地委召开会议的第二天，大家上午刚开完会并吃过午饭，时间已近午后估计敌人不会再出来扫荡，正在休息的时刻，有群众来报告说：“发现有穿黄军装的部队，正向岚峪方向开来”。最初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不一会就发现敌人，已经把岚峪村包围起来。当时同志们立即整理开会的文件向外冲去，敌人已在对面开枪射击起来。大家向东南方向山区的梯田上转移，可以得到层层的高阜地带作为掩体。王晋亭同志刚撤出岚峪村南不远，他的头部就被敌人打伤，光荣地牺牲在水井旁边，战争结束敌人撤走后，同志们回到岚峪村内，把王晋亭同志的遗体装殓并掩埋起来。然后派人到黄河西岸的泰西地委领导机关报告岚峪战斗的经

过，地委立即向鲁西区党委发了急电汇报。中共泰西地委书记袁振同志，主持了隆重追悼王晋亭同志的大会，在岚峪战斗中脱险的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武静安同志，在会上报告了王亭同志壮烈牺牲的经过，同志们都为失去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战友感到十分悲痛！

王晋亭同志的忠骸，开始葬埋在长清岚峪附近的山上。一九四六年三月间，他的胞兄王连仲同志，得到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四专署张耀南，谢鑫鹤同志的帮助，才于三月二十五日把他的灵柩由黄河东岸迁回故乡安葬。当时中共堂邑县梁水镇区委，基于民兵和革命群众，在王晋亭同志的墓前，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大会。一九四六年八月冀鲁豫行政公署所属堂邑县烈士祠建成，王晋亭同志和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壮烈牺牲的一百八十位革命烈士，同时入祀其中。堂邑县民主政府，为他们树立了“民族英雄”纪念碑，“王晋亭、解占伯、齐南峰等一百八十位革命先烈纪念碑”，使春秋节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瞻仰和祭扫。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清明节，王晋亭同志的墓前，新树起一座纪念碑，他生前的不少老战友，都由聊城和外地赶来，向革命先驱者举行了祭悼。

傅 阁 老 (1)

范景华

傅阁老，即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清朝第一个状元；康熙的老师；一直为清世祖顺治所器重，官至武英殿大学士（2）兼兵部尚书（3）；是清初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

一六〇九年十月十二日（古历），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父思敬，祖天荣，曾祖谕（傅谕）。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因始祖于明朝成化年间为东昌府冠县令，故定居聊城。自始祖至傅以渐七世，从傅以渐到傅斯年恰又七世。

傅以渐少时聪明过人。据《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一级傅公家传》记载：“公生而颖悟强识，三岁能诵书，五岁熟记经史不遗一字，十岁工属（撰写）文，博极群书”。

傅以渐所处的时代，正处社会动乱的明末清初。且其家境极为贫困。但他发奋苦学，矢志不移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据载：“公素贫，作文苦于无纸，每起草于墙壁间；夜以香头照读，苦志力学，二十年犹如一日。”当时，天下大乱，城东南书院众生辍学，唯傅以渐攻读不懈，终成大器。

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大考，傅以渐以进士及第之

第一（即状元），首夺大魁，位列清华，授宏文院修纂（4）。尔后便“累迁”、“擢升”不次。四年（1647年）会试同考官。五年（1648年），充任《明史》纂修官。八年（1651年）闰二月，迁国史院侍讲（5）。九年（1652年）正月，任《太宗文皇帝（顺治的父亲皇太极）实录》纂修官。六月，迁左庶子。十年（1653年）正月，擢升秘书院侍讲学士。同年五月，迁少詹事。闰六月，升国史院学士。七月，任教习庶吉士。十一年（1654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1655年）正月，傅以渐向皇帝陈述有关国计民生的三件大事，均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皇帝的意图。顺治又命作《资政要览后序》。二月，加封傅以渐为太子太保。不久，改任国史院大学士，兼文武殿试读卷官，并主持编辑《太祖高皇帝（顺治的祖父努尔哈齐）、太宗文皇帝圣训》和《通鉴全书》。又承旨撰《内则演义》、覆核《赋役全集》。十三年（1656年）八月，在监察御史面前申请辞职。不久得到顺治的圣旨：“您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臣，淳诚朴实，勤劳谨慎，怎能引退呢？应该舒展您的宏图谋略，辅佐皇上，教化人民，治理好国家”。

一六五七年二月，傅以渐和庶子曹本荣奉皇帝旨意修书《易经》。顺治说：“我看《易经》一书，精深奥妙，应用广泛，包罗天地万物之哲理。自三国时魏国的王弼有《周易（易经）注》，唐代的孔颖达有《周易正义》，宋程颐有《伊川易传》，到朱熹的《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本）问世，后来的学者一直用来作为研究《易经》的标本。明朝永乐年间，又命儒生学士综合元代以前研究《易经》的各家之

说，汇为《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本，系翰林学士胡广等纂），对《易经》多所阐发。但此书同异互存，并未删繁就简，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从《周易大全》的成书至今，近三百年，儒家学者发挥《易经》的也不乏其人。应取各家之长，辑成一编，以饷后辈。你们要尽心研究、融会贯通，希望做到：简约而又概括，详尽而不重复。使伏羲氏的《易经》奥旨，象日星一样永放光芒。”一六五七年十二月，傅以渐遵旨完成了《易经通注》（6）的编纂任务。是年冬，皇太后违和群臣，惶惧内阁，奏疏颇多，不两月，奏章积八百余。傅以渐三日之内，独自批阅处理完毕。顺治甚喜。

一六五八年二月，傅以渐和学士李蔚主管大考，有关人员上奏皇帝，禁止考官携带书籍进入考场。而考官仍要求带书应试。傅上奏皇帝，废除禁例，准许携书入场。在主考中，傅以渐积劳成疾，吐血发病，乞赐另遣一员，同李蔚任事。九月，改内院为内阁，授以渐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月，因病乞假回籍。一六五九年十一月，以病逾一载乞罢黜。顺治命：“加意调理，稍痊即来京入直办事，不必引请处分。”一六六〇年三月，傅以渐再次申请辞职。顺治特派使臣来聊城察看傅的病情。并称赞他：“清廉谨慎，为有功之臣。应注重治病。一旦康复，即来京供职。”一六六一年正月，康熙即位，傅以渐复疏乞罢。下部议准解任在籍调理，病痊愈起用。（参见原《国史例传》）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傅以渐在家养病期间，曾主持编纂《聊城县志》，给地方做了某些有益的事情。

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群僚中，傅以渐是一位竭成尽

忠的贤臣良相。顺治待傅以渐“圣眷隆重倍于同僚”，凡机务大政，都与其磋商。武定府教授陶山耿贤举说：“太祖高皇帝配天诏、拟御制，太宗实录文，皆出公手。公凡文事，悉委任焉。”又有史料记载：顺治破格提拔傅以渐为兵部尚书，众皆赞同，一致认为：选择得当，用人适时，宫廷和睦，天下太平。因此，傅以渐因病要求罢免，顺治每每不肯，曾命大学士车克（7）传谕曰：“君臣之谊，终始相维，今云勿以引年请归为念。尔等岂能违朕？朕亦何忍使尔告归也！”

在专权牟利、贪污受贿的清朝官场里，傅以渐也称得起一位廉洁奉公的“清官”。《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赞傅以渐“以清勤著”。其他史料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公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絮苴浣，无异寒素。”“事二亲至孝，待宗族友以爱，与人宽易温和，从无疾言遽色。处同列十余年，无有见骄矜嫉妒之私者。奖掖后进，如恐不及。有古大臣休休（8）有容风。闻百姓疾苦，痛切于身，心思拯济乃已！”临终遗言：“勿请恤，请谥。”（嘱咐家属不要抚恤，不要追加封号。）

傅以渐治学严谨，精于考究，湛淫刻索，矻矻（Kū 勤奋）入解，学识渊博。儒生学士尊之为“星岩先生”。某些史官学者认为：傅以渐“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明末清初，“文章风气皆尚浮诞（dàn 虚夸）。”公以开科鼎元（第一个状元），恪守理法，使文气为之一变。”傅对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马政、无不讨论，手集十三经、二十一史、性理通鉴及诸子百家，咸会萃成书。

生平著述及在在朝奏议颇多。曾著有：《狐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易经通注》、《内则演义》、《诗经礼记春秋题说》、《贞固斋四书制义》、《贞固斋诗集》、《易经制义》等等，悉毁于火。唯《四书易经制义》幸存于家配虞氏故居。

《晚晴簃诗汇》一书中，载有傅以渐描写宫廷生活画面的一首诗，兹录如下：

早朝咏炉烟次同院韵

玉殿晨开静羽旗，
遥看烟气上彤墀。
微升宝鼎分行细，
直接晴云散缕迟。
旭日乍融光似篆，
晓风欲定霭成丝。
清芬想象浮龙袞，
仗外千官望自知。

羽旗，用野鸡的羽毛和旄（máo）牛尾装饰旂杆制成的一种旗帜。彤墀（tóng chí），朱红色的台阶。清芬，高洁的德行。龙袞（gūn），皇帝的礼服。前六句以“烟”为线索描绘出玉殿晨景，后两句是颂扬之词。这是由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此诗固然称不起“绝”，但毕竟还有些画意，且韵律谨严，对仗工整。使我们对于傅以渐的性格、为人，可略窥一斑。

诗如其人。傅以渐面形方正，颧下多髯，伟腰大腹，不惯骑马。常乘一黑驴，令二仆执辔（Pèi缰绳），往来于宫

廷之间。“世祖（顺治）偶见，大笑。”一天，赐画轴一幅，乃图状元傅以渐骑驴小象。此系顺治亲挥宸翰（皇帝所用的笔墨）为作小照，并题云龙山下拭春衣诗于其上，改末句的“马”字为“驴”，即“状元归去驴如飞”，一时传为佳话。傅以渐相得之雅，从可想见。

后人借题发挥，曾有演义诗一首：

阁老骑驴来玉殿，
康熙引缰走在前。
若非太保展雄才，
清鼎岂能安如山！

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十九日午时（古历），傅以渐病逝于故乡骆城，享年五十七岁。其身后葬于城南傅家坟祖塋。坟墓在文革中荡毁无遗。

据《东郡傅氏族谱》（道光年间嘉荫亭藏版本）和《聊城县志》的记载：傅以渐薨后，皇清诏授其三代俱为光禄大夫；大学士高阳李蔚亲撰碑文；吏部主事许其进撰《明孝子完贞傅公传》；史官宋弼撰《少保大学士傅公传》；武定府教授嵩山耿贤举亦撰文。中宪大夫（9）、督理贵州清军粮储道、掌京畿道监察御史（10）、翰林院编修榆山朱续晔，为《东郡傅氏族谱》写序；中议大夫（11）、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为重修《东郡傅氏族谱》撰序。

朱续晔说：“东郡傅相国，鼎革时以牖传第一，为国元老。其功业炳然，载在史乘。”宋弼说：“公居官恂恂谨谨，不奔兢于势力，不谄随于门户，隐然有公辅之望矣。”当时，“诸宦权势相轧，党援贪戾者多矣，虽卒，归败覆。

其与倚毗何如也？傅公见可而进，审几而退，既清且慎，不争不党，君子人与古之大臣欤！”

注释：

（1）阁老：在内阁中办事，替皇帝批答奏章，商承政务，威望特高，实权甚重。往往兼任尚书、侍郎，加官至一品，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2）大学士：本为掌文学著作之官。凡学士中资望特高的加“大”字。清代之大学士，官阶正一品，在所有文职中居第一位，并享有最高的荣誉。一般以授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为拜相。

（3）兵部尚书：相当于《周礼》六官中的大司马。

《唐六典》中解释：“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图，厮牧甲仗之数，悉以咨之。”清沿前制。

（4）修撰：唐代本为任修史之职者。清制，在殿试后，赐进士及第之第一人（俗称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当时，以布衣一旦得到六品实官，被认为无上荣誉。

（5）侍讲：侍读、侍讲、侍讲学士，是以备皇帝顾问古书中疑义之用。清代的侍讲学士为四品官，侍讲居下。

（6）《易经通注》，共九卷，国朝大学士傅以渐等奉敕撰。顺治十三年（1656年），世祖章皇帝以《永乐易经大全》繁而可删，华而可寡要，因命以渐等，刊其舛譌，补其阙漏，勤为是书。”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月告成。（引自《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时间与原《国史列传》说法不一，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的说法为准。

(7) 车克：姓瓜尔佳氏，满州镶白旗人。曾任户部尚书，秘书院大学士，加少师兼太子太师。

(8) 休休：安闲自得、乐而有节貌。《诗·唐风·蟋蟀》：“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9) 中宪大夫：清代，凡正四品概为中宪大夫。

(10) 监察御史：隋唐始置，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虽官居八品，但在朝列中为人所严惮，本身也自视颇高。清代设京畿，江南两道监察御史。京畿道分理院事及直隶、盛京刑名，稽察内阁，顺天府、大兴、宛平县。官阶升为从五品。

(11) 中议大夫：金代文阶官之制，明清升为正四品。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改稿

黄河流经聊城考略

葛 渊

(一)

在四千年前的尧舜时期，天下洪水为害，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尧封鲧为崇伯，命他平悉水患，因治水无功，后被舜杀死于羽山。舜令益掌火烧山，驱逐野兽，又令禹治水，发展农业生产。禹改变父亲鲧的堵水办法为疏导入海，收到成效。当时他引导汶水、淮河等注入长江，在黄河流域疏浚九河，治理济水、漯川而注入大海。禹跋山涉水，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平息水患，使人们由游牧为主转向以耕作为主，推进了生产的发展。

夏禹治理黄河是从公元前2278年开始，上游自甘肃省临夏县西北的积石山导流，穿过皋兰盆地，经兰州走向东北，来到了被称为“塞外江南”的银川平原和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急转南下，（以下是中游），穿行在晋陕交界的峡谷之中，这里高山夹峙，一泻而下，在壶口山形成瀑布，再往南穿过龙门，水势磅礴，咆哮万里，大诗人李白曾有“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诗句描述这里的情景。黄河出龙门后，在潼关和渭水汇合折向东流，过了三门峡到河南孟津县。由孟津到入海口是下游。

黄河从高山来到辽阔的华北平原，向东北漫流，经过浚县东南的黎阳山，北穿漳河至河北巨鹿形成九条溜道，禹因势利导进行疏浚，并自北向南依次命名为徒骇、太史、马颊、复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后人称为“禹疏九河”，其最南的一条是鬲津河，约在冀鲁边界的德州、陵县、乐陵、盐山一带，旧名四女寺减河，即今漳卫新河。

由于黄河上、中游多行于山区，水流湍急，来到下游平原地区难以约束，为分泄洪水，禹又从河南济阳向东开了一条河叫济水，目前东阿鱼山至济南洛口的一段黄河，走的是济水故道。同时，又在浚县向东开了一条河叫漯（音塔）川，这是近代徒骇河的前身。古漯川流经聊城，因此，我县为夏禹治水活动之地，是上古时期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二）

解放前的黄河是一条灾难深重的河流，它以善淤、善决、善改道闻名于世。所谓善淤即是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及其支流带来许多泥沙，淤积在下游的河床里，随着河水泛滥也淤积了整个的黄河流域。由于历史上黄河五次流经聊城，持续时间达两千年，因此，泥沙对我县地形土壤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全县都属于黄河冲积平原，也叫黄泛平原。县境西部的沙镇、郑家、张炉集、堂邑、道口铺和阎寺公社上堤等高亢地区都是古河道和泛滥主流而形成的河滩高地，一般宽达十至二十华里，有些地方也出现纵横交错的溜沟或沙丘，现在的沙土岗开始时多为黄河急流与回旋所造成，我县城东聊阿、聊荏交界的地方，也是过去的黄河故

道，其地形有类似情况。靠近古河道的西新河沿岸和四新河流域，大部分是缓平坡地，是黄河泛滥漫流沉积所形成。我县的白家洼、谭家洼、牛家洼、十二连洼等，是黄河泛滥的尾水缓流或静水沉积而成。全县的土壤都是黄河携来的黄土高原的自然土壤，多为细沙、面沙、粉沙和粘粒，在沉降过程中因水流的急缓而组合成沙、壤、粘等不同的土质，群众说：“慢出淤，紧出沙，不紧不慢出莲花（两合土）。”各种土壤都是伴随地形地貌而有规律的分布着。

所谓善决，就是黄河容易决口，四千年来，黄河有历史记载的决口共计1591次，仅满清统治的269年中，决口有六百次；民国期间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十二年中，决口达九十四次之多。我县历史上有两次县城淹没，一是五代时期，后晋开运二年（公元九百四十五年）水溢王城，二是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九百九十二年）河决巢陵，都是黄河从东边县界附近决口而造成城池毁灭。

所谓善改道，就是黄河的河道经常变化，改道迁徙，人们称黄河的这种性质为“游荡成性”。一次改道就带来一次可怕的水灾。据解放前二千多年间的史料记载，黄河重要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中大改道九次，水灾波及的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苏、安徽，纵横二十五万平方公里。黄河在聊城境内经过有以下几次：

一、东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决口于河南浚县宿胥口南岸，东行漯川，经渭县北、濮阳南、范县北、莘县西、聊城堂邑间、博平东、茌平西、至平原南，折向济阳入现河道。就是黄河流到济阳后走的现在的河道。同

时，黄河又在渭县东北的长寿津分出一条支流，经濮阳西、清丰西南，至交河县合于漳河，复归黄河故道，经沧县、青县、大城、至章武入海。这是有史记载以来，黄河第一次改道，而且分为两条河道，其主流穿越聊城，是第一次在我县西部经过。持续时间四百七十年。

二、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口于清丰西南的顿丘高岸，经观城、朝城、聊城西、博平北、至禹城东门，折北至埕利附近入海。这是黄河第二次在我县西部穿过，但时间很短，春天改道，五月又在濮阳西南的瓠（音户）子决口，向东南流入巨野，夺泗水故道，转注淮河入海，造成黄河史上第二次大改道，也是有史记载以来，黄河南归淮，泗的开端。从这里可以看到黄河改道频繁，游移不定。这次改道灾情严重，洪水泛滥十六个郡，涉及济宁整个地区和聊城地区南部。

三、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下决心堵塞瓠子，引水北行，使黄河复归周定王五年的河道入海，但由于黄河南行淮泗已二十三年，原河道堤防残破不全，因此，第二年（公元前108年）黄河又在馆陶的沙邱堰决口，冲出一条新河，名屯四河，与大河并行。正流自河南浚县西南流向东北，经渭县北、濮阳西、大名、冠县、堂邑、清平、博平、高唐、德州、至河北南皮西，在沧县东北入海。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第三次较大的改道，也是第三次经过聊城西部，持续时间一百二十年。

以上说明黄河三次经过我县西部，共计五百九十年。

四、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口于濮

阳、大名之间的魏郡，经南乐、观城、朝城、阳谷、茌平，至禹城北行，经陵县、乐陵、博兴至利津东北入海。这是黄河第五次改道，由我县西部移到了东南，行于聊城、聊在边界地区。是第四次经过聊城县城。

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河收到成效，从河南到海口修筑了许多堤防、闸、堰等工程，使河道长期没有滚动。以后经历三国、两晋、隋、唐各代，直至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河道南移为止。黄河在我县东南部经过的时间为1023年。

五、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又在南乐县附近决口，冲出一条新河，与原河道分流，东北走莘县、冠县之间，经堂邑、清平、高唐、夏津、至平原合于穹马河，经乐陵南、无棣北入海。是黄河第十次较大的改道。黄河离开我县东部二十六年之后，又第五次进入聊城，走唐开马颊河故道。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后，金、元至明代中期，河道极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彼此迭为主次，东流则由马颊河或徒骇河或北清河入海；南流则夺泗、汴，由淮河入海。明万历初年潘季驯治河，把南流固定下来，成为下游唯一的河道。东流堵塞，黄河离开聊城。在上述年代黄河滚动于徒骇和马颊河上，经过我县的时间约400年之久。

尔后，黄河虽然不再经过聊城，但有些重大的决口泛滥仍然威胁我县。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大决于河南兰考铜瓦厢，改道北流，结束了黄河南流夺泗入淮

六百多年的历史。这次决口，流分三股，其中两股至张秋镇汇流穿运，夺大清河（今东平以下的黄河）于山东利津入海。形成了现代的黄河河道。这是黄河第二十五次改道，当时，因大清河狭窄，堤防残破，不能容纳大量洪水，以致到处漫溢，使沿河各县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这次大水也泛及聊城，东昌周围一片汪洋。

黄河形成现代的河道以后，一九三八年又有一次大的改道，当时虽然不在山东，但灾情之大震惊世界。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日寇进迫开封，国民党政府将郑州花园口南岸大堤挖决，使滚滚黄河水泛滥于、苏、皖三省四十四个县市，淹死八十九万多人，损失财产达十亿元。这是黄河第二十六次改道，历时九年，后于一九四七年五月黄河又复归山东故道。

（三）

黄河自明万历年间离开聊城已有四百年了，但它在我县历史上对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两千年中黄河在我县五次改道，出尔反尔，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黄河决口泛滥遍及全县，而每次泛滥则是洪水漫流，遍地行舟，村庄受袭，田园淹没。今天丰收在望，明天是水色连天，汪洋一片，劳动人民一年的血汗成果顷刻之间付之东流。而黄河涨大水时，则是浊浪滚滚，咆哮千里，人心惊骇，居民逃散，两千年中不知卷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财产。黄河留下来的沙丘、淤洼，今天仍然是农业生产上的绊脚石。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恶劣

环境中与黄水搏斗，与天地搏斗，锻炼成艰苦奋斗、勇敢不挠的刚毅性格。物质的损失换来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留传给子孙后代。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对黄河展开了全面治理，使古老的黄河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辉。首先沿河人民加高加宽了一千八百公里的黄河大堤，近年来我县民工近万人两次参加了黄河复堤工程，沿河人民积极防洪，使凶勇不驯的黄河安然就范，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决口泛滥。同时，还大力发展引黄灌溉，利用黄水资源浇灌农田，把害河引向为人民造福，在正常年分，我县每年引用黄水二点五亿立米左右，最多年分引水四点八亿立米。黄水灌溉了田地，补充了地下水源，全县井河浇地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有效地促进了粮、棉作物的高产稳产。引黄还补充了城市工业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并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发展了养殖事业。使聊城的自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黄水已成为我县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

注：本篇资料来自《中国水利史》、《黄河变迁图》、《水经注》、《禹贡锥指》，以及《孟子》一书的有关章节。

聊城毛笔制作与刷纸业史略

吴云涛

一、聊城毛笔制作业今昔概况

聊城的毛笔制作业，最兴隆时期为明代的中叶，直至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公元一六六二——一八二三），还相当兴旺。据民间老制笔工人张士义谈：他小时候做学徒工，据说在光绪中期，全县的毛笔工人还有八、九百人。如再上溯，总在千余人之上。清末的这一行业，虽然稍见式微，全年的总产量，仍不下三百余万支。大小作坊达三十多家。其记忆所及约有：

余子尚、玉山堂、老文友、鲍乾元、魁允堂、
恒顺堂、文聚堂、德华斋、德润斋、老魁盛。

以上这十多家，都属于大型作坊，资东多为客籍，如武汉、太原、章邱、衡水、上海等地。工人多者百余以至八十、五六十，少者三十余人不等。当地的小型作坊则有：

万元长、文元斋、松华斋、运泰兴、文宝长，
文林堂、文玉山房、文美斋、文元昌、德顺长、
德顺兴、辉兴斋、万合堂、一品斋、同志堂、
同合堂、泰和祥、同合堂达记、同合堂祥记、
泰和兴、文玉林、松林斋。

以上各家的工人或十多人，或五、六人不等。这些大大

小小的作坊，当然不能包括全面，还有些字号已失传。中间开业和歇业经营时间不长的，自然还有不少。这些作坊、店铺除主营毛笔外，有的还兼营有关文具货品，如卖纸墨、砚石、印色、卷纸、信箋等。

进入民国之后，聊城的毛笔制作业，随着木版书的没落，也逐渐呈现凋零景象。大作坊相继关闭，小型店号勉强维持，全县的毛笔制作工人已不过二百余人，年产毛笔约五十多万支。

聊城解放后，毛笔制作业的个体经营者，为响应党的号召，于一九五六年走上合作化道路，提高质量，改造技术。并迭次派员，还赴浙江湖州，向著名的毛笔生产地的“善琚毛笔厂”，学习先进经验，吸取其长，因地制宜，对工序操作方法，选择材料，外表装饰，都尽力地进行革新，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一九五七年曾由“中国工艺品出口公司”，先后从青岛发往香港、日本、南洋群岛等地。一九五八年从上海、广州出口二次，每次约一二万支。我县毛笔远销海外，为国家争取外汇，在我国的优秀工艺品中，获得了一席的光荣称誉，证明了这种长足发展的毛笔制作业，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与社会主义新时代，才有可能做到。一九六五年前后，聊城两个文具生产社的毛笔制作车间，约三十多人，每月总产量，约计三万至四万支。以后达到六至七万支，归百货站经销。

二、制作毛笔的原料与工序

制作毛笔的材料，笔头是羊毛、黄尾、兔毛、苘麻等。

羊毛产苏杭地区的较柔致好用，北方羊毛粗涩，制笔尚难入选。写大字的笔多是羊毛，但羊毛中也分为几种，按其质量高低有“透爪”，“双卷”，“脚爪峰”，“白尖峰”等名称。大字笔也有用猪鬃制头，装以角质笔碗，称为碗笔，更有所谓“抓笔”，没有笔管只用混角巨碗装头，写绝大之字以手抓取而挥。大字笔以一提二提分巨细。纯羊毛做的笔，称为“羊毫”。性柔软无骨，没用惯的很难掌握。但运用熟练灵活，居然挥洒自如。如近代书法家武中奇，以他自制的鸡毛笔，书写擘窠大字，挺遒有力，似比羊毛还要柔弱而若能利用其富于弹性轻捷，掌握得法，就能起到心领神会，得心应手的艺术效果。写小字的笔主要材料是兔毛和狼尾，但也有羊毛。兔毛是杭州方面所产的“淮兔”。狼尾是黄鼬狼尾巴上的毛。羊毛掺入部分黄尾，称为“兼毫”，或掺兔毛，称为“七紫三羊”，意思是指内含七分兔毛、三分羊毛。狼尾局部的毛，锋芒坚韧，兼可耐用是“材料笔”中的主要原料。

笔头是拿苘麻为中心的，是谓“笔胎”。笔胎的外围，方用羊毛或狼尾，称为“盖毛”。看一支笔的好坏，第一须使其笔胎扎实，尤其盖毛的厚薄、长短、都要做到均匀适合，行中术语，对笔尖质量标准，于水盆车间要求是“裁子齐”和“沾子开”，于干作车间要求是“头锋齐”、“二锋清”等等。总之也就是必须做到尖锐齐整，苘身梳爬透彻，使用时不可发现乱毛扎散尖不抱拢之毛病。

笔管产浙江余杭，粗细不等。须要挑选，烤直，才可应用。是由手工雕刻，要求精楚挺秀。也有用铁制字模火上烧

过烙印的。近来有拿象皮刻戳盖印的，但容易退落。

制做一支毛笔，要分“水盆”与“干作”两项工序。这两者之间又要经过六、七遍的工序，就是：（一）由水盆将笔头做好，（二）交干作套笔，（三）择毛，（四）贯笔，（五）刻字，（六）镶管，（七）封包。其中每遍工序，还有琐碎细节，据说要经过大小七十二遍手，才能成为货品。如果以各种工序，综合计算，每个工人一天可出笔三十支左右。水盆和干作这两大工序，由于过去的传统习惯，在学徒期就分工学习，不会两者兼做，也就是只会一半方法，不懂全部技术，目前似乎还没有完全扭转这个封建性的固执做法。

三、聊城毛笔业的衰落和今后趋势

所谓“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发动之前，聊城毛笔制作这一行业的生产合作社，多已解体或已改弦易辙分散经营，四凶气焰嚣张时期，地方秩序陷于混乱。毛笔业已无大宗生产的单位，甚至频于绝迹，有的乡村公社或个体，也有毛笔生产，已经谈不到质量好坏，只是多为写大字报作销路对象而已。总的说来，毛笔为什么趋于没落？聊城毛笔的优越传统为什么越闹越江河日下？其原因似乎不外这几方面：技艺较高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日渐凋零。一般青年人对此手艺很少刻苦钻研学习，尤以文化大革命这些年中，师徒关系由于所谓“革命行动”而形成了情感恶劣的对立状态。哪里还谈到传授技术和继承接班人？再有，现代的书写工具像钢笔、圆珠笔、排笔铅笔等，普遍使用。如写帐、写信、写票据、写便笺等多已不用毛笔。小学生的作文、日记均以钢笔代之。至于摹帖写仿更不列为正式功课，如果没有书法和国画

的提倡、匾额联对等的必须应用，那末，这毛笔几被归于淘汰之途。但是，虽然情势如此，这传统数千年的毛笔，是废除不了的。而毛笔的发展和保持原有优点受到阻碍，上述种种也是原因之一。尤有甚者：个别单位或工人，本无超越技术又加粗制滥造，足以影响于聊城毛笔的名誉，增加人们不良印象。死下，已是外地毛笔充斥市场，本地产品已不绝如缕。

一九八三年的春季，聊城硕果仅存的几位毛笔老师傅荣金安等，他们鉴于地方特产素著历史盛名的毛笔，如此衰微颓败，深抱遗憾，于是呈请政府批准，成立了“聊城毛笔厂”。抱着恢复原来优卓质量，精工选料，一丝不苟，采取外地先进经验改进并各废除陋习，培养学员尽心教授高标准毛笔各项技艺。地方有关领导机关，很嘉励这些老同志们老骥奋志为聊城名产挽狂澜于既倒，谋中兴于现代的雄心壮举，予以热情支援扶持前进。

四、聊城刷纸业的兴旺时期

聊城的刷制色纸、做帖套、信封信笺等这一行业，也是由来已久的。从明、清、以至民国，此类商号总不下几十家。在民国初，还有二十多家存在，如有：

鼎裕成 同和成 兴盛久 东元恆 义源号

启明号 和生号、复兴号 裕德成 兴记号

鼎泰成 德盛永 三合盛 同兴永 等……这些店铺资本多系本地人，其中也有山西客商在此经营，称为“晋帮”。出品以红纸为主要产品，杂色纸还在其次。远销口

外，及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俗称为“红纸作坊”。刷纸的工人全是聊城和堂邑这两县的。他们师徒世代相传、辈辈不绝。一贯以手工操作的土法，多年传统的技术，来对料、刷色、蒸纸等等工序制为成品。这类艺人由于多少年来相传继承下的积累经验，吃透了纸质的特性和染料搭配的化合作用，因而出品质量优良，驰名远近，成为一种地方重要手工业和特产。大约在明、清两朝，漕运畅通之时，运河粮船往来频繁，这里的色纸，大量倾销外地，业务相当兴隆，至于当时的交易数字，没有传留下明确的记载，现下已无法知晓了。这一行业多集中于聊城东关运河沿岸及清孝街、铁塔寺一带，和年画门神店号，有密切联系。资金较优厚的刷纸作坊，秋冬季也兼营门神年画生意。或另用一个店号。销货期过去即行停业。

五、由国产到“洋色”的刷纸颜料

国外的“洋色”，还没有输入我国的时候，染刷红色和其他杂色的纸张，都是依靠由国产植物中来提炼染料，刷出色来，足然色泽鲜艳，并可耐久。比舶来品的洋色要好得多。

“梅红纸”是色纸中品质较好，而应用广泛的一种大宗产品。它每年的销售量，可占全部色纸总销额的半数以上。刷制梅红用的染料，以红花为上品，苏木次之。红花还可以制出红和黄两种颜色，刷制梅红纸需用大量的红花。红花产地在河北省藁城、滑县一带。那里大面积种植、收获丰富，质量很高，当地农民以此项副产品收入，生活富裕，因

此有“金滑县、银开州”之称。红花每年大批的运到聊城卖给各家刷纸作坊。

红花的加工过程，是有一套传统技术的，据说头一道工序先要经过“洗”。洗是把花子浸水中用足踩蹂，滤出杂质炼为液体，这个洗的操作技巧，其轻重疾徐和时间掌握，非有熟练经验不可。红花液汁第一遍刷到纸上，呈一种淡赭色。第二遍再用银桦水重刷，就立时鲜红夺目，艳丽无比，任它风吹雨淋，可保证一年不会褪色，这类以红花刷制的梅红纸称为“上红”，也叫做“花子红”。据八十多岁的刷纸老师傅肖学文说，刷制梅红纸应用的水，是从运河中挑来的。运河中水是终年长流，而水的所含成份却大有差异。由“通济闸”往北到铁塔寺，这长约二华里的运河流域的水分量很重，浸洗红花作刷色液体，十分适用。如果以同等原料用别处的水，就大为逊色。那时工人们也不懂得什么化验，更不推求它的原因何在，只是凭实际体验感到神秘而已。

红花以外的“苏木”，也是大量需要品，这种原料产自东印度。我国也有培植，又名“苏枋”，为常绿乔木，茎有刺，以木髓汁，可染红色。用它刷纸时，也要费一番手艺的。据老师傅告诉：苏木初熬时，要投入滤细的石灰膏及少许松香等。成汁后，刷纸一遍，色泽很淡。再加入水胶融液，重刷一遍，纸色还是暗然无光，最后一次投入明矾，再刷，纸就居然骤变颜色，才能成为红亮耀眼鲜明可观的成品。从前的劳动人民，象这种干刷纸手艺的工人们，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更不理解什么物理化学作用，只凭多年摸索的经验，不知他们从实践中经过多少次失败，才创造出这样的

技巧，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刷染蓝、绿两色的纸，也有一种植物原料，盛产于山西省，俗名叫葵花，学名是甚么。尚待考证与访问。这种葵花状如蜀葵，也很美丽。采用成熟后的花朵，经过加工熬汁，或者还有别材料加入，刷成纸，色亦耐久不变。这种原料每年由山西太原等地的客贩，大批的运到聊城来，销行于各家刷纸作坊。

黄色纸是用槐米煎汁刷染的。色泽鲜艳而不脱褪。槐米就是槐树未开花时的蓇葖，穗穗簇结，形粒如米，槐树在我地到处栽培，无须旁求。过去的旧社会中，江浙等省出产的迷信品“黄表”，其着色原料，就是槐米。确比洋色漂亮。从前聊城的槐米，为主要土产品之一，每年大量地运销南方。

六、广丹、铅蓝两种刷纸原料

除梅红纸之外，另一种“丹红纸”色作橘红，多用于过年时书写春联，也用它做轴对中心，另具有一种雅素庄严姿态。刷制这纸的原料，主要物是“广丹”。又名铅丹、淬丹，为一种矿物质混合铅粉制成的。来自闽、粤等省，用大木桶装盛。也有的适应零售，作半斤包装的。广丹刷纸着色，仍需加工加料。用生黄豆、水内浸透、放入水磨子里，研成汁浆。广丹也同样地经过水磨子推研，成为极细腻的液体。这两种原料，都由作坊中的老头脑（等于工头、工人中技术较高、资望较老的人）亲手掌握，两者掺对妥当，再交工人。或由老头脑把广丹汁弄好，由工人刷纸时，现掺豆

汁。临时必问老头脑：“是掺几碗的”？因为液体若干碗，应刷出色纸若干刀，都是有其一定标准的。刷蓝色的纸，除葵花为原料外，还有一种铅蓝，也叫做“山西大洋蓝”也可以刷染蓝纸，这种原料是山西省土特产品，它与广丹是同属于国产的染色颜料。

七、刷纸与纸胎

刷制色纸的方法是很简单的。把成刀的白胎，平铺在案子上，拿起棕刷，将盆内颜色汁往纸面上刷。先从边沿刷起，再向中心扫过，一张纸就很快刷成了。随着使一根细竹竿或粗荻杆把纸挑起，挂到一拉溜的木架子上，使它通风易干。冬天里，院子里寒冷，难以晾晒，就挂在生炉火的屋子里。刷纸时刷子往盆里蘸一下色汁，就恰够刷一张纸，绝不可一蘸再蘸，这是熟练自然不差分寸的，快手的工人每天都可以刷红纸四至五刀，如刷杂色纸，可刷六刀至七刀。因红色纸要刷两次，较为费工。辛勤劳苦的刷纸工人，长年累月地和色盆棕刷为伴。干活时只见他边刷边挑，手不停挥，迅疾匆忙地工作着，而供应广大地区的需要，普及于民间，消耗量是很大的。

丹红和梅红，销路比较广泛。价值也高于杂色纸。它所需用的纸胎和颜料，从各个方面，也必须力求合乎标准质量。别的杂色纸，纸胎有用“四则”纸和“京方”纸。以后多用“洋粉连”。好梅红纸胎，纯用国产“五合毛边”，因它质地坚韧，并无残缺。这纸产于福建，长三尺八寸宽一尺八寸，比其他纸幅页较大。没刷色之前，先要把纸胎上矾，

上矾后再蒸一小时之久，蒸透后，刷色时不至于水沁纸背。如果刷制次等的梅红或丹红，那就不用成本较贱的四则纸，京方纸和洋粉连纸，洋粉连有矾性不必蒸。四则纸纸质粗糙，且张页中常发现局部罅隙，刷色之前，更得要逐页检查，随手补缀，有的纸缺少矾性，临刷色前，用胶水拖一遍，也就不必再蒸了。

丹红和梅红，上色后有洒金的，用剪碎的方金银细屑，筛布纸面，增加美观。再考究的则用捶金叶子，往纸面上贴金，富丽辉煌、倍加耀目。洒金之前刷色汁中，要掺入麒麟干水，因它性粘易于贴固不落。

除梅红丹红外，杂色纸中还有一种次品，纸胎是用“云尖”，这类纸短而窄，长二尺四，宽一尺二寸，每刀百张，一袋盛二十五刀，残的多，这纸和四则纸，都称为草料纸，产于汉口一带。刷云尖纸、未刷色前，先把漂过的白土粉子搅为液体刷它一遍，每个工人每天可刷八至十刀。各种颜色的都全，专以卖给扎彩匠人，用以扎制纸质动物人像等冥器，供丧葬家随殓前导，有如仪仗伞旗的装饰品。此种迷信民俗，从前盛行，云尖色纸大量产销。还有一种“蜡花纸”，专用以表糊房间、别的用途很少。尺幅不大，只是以洋粉连三开做胎。制法用白粉子和蜡质把纸面刷过后，在刻有花纹的木版上，一张一张地用光滑的“鹅卵石”研摩、使花纹发出了亮光、木版花纹图案也是多种多样，有“五福捧寿”（五只蝙蝠环绕于篆体圆形寿字）有“云飘鹤翔”等类不一，雅素幽美，洁白如雪，且含韧性而耐久，这种纸品，已绝迹多年了。

八、充斥市场的刷纸“洋色”

自从舶来品颜料，大量倾销中国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剥夺了我国国产颜料的销售市场，并摧残了它的生产和发展的前途。因为洋色品种多，使用时较便利，不需要什么加工手续，拿过来使用，这样它逐渐代替了从前的土产颜料，使我们刷制色纸业，多年来积累地煎炼加工经验技术，似乎淘汰不绝如缕，濒于湮没。不过，洋色最大的缺点是容易褪落。刷上了纸，马上看是挺鲜亮的，时间不必多久，便黯然无光了。这也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者，货品的质量恶劣，骗哄一时，根本目的为掠夺金钱和“拆烂污”的一贯伎俩。

因洋色的质量不可靠，一般刷纸业作坊，为了维持以往声誉，如刷制梅红、丹红等高级纸张，还是采用原始颜料，因此对国产颜料的加工技术，还能保持下来未致失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外颜料来源断绝，我国国产染料，又一度倡兴。但是延续不久，又被舶来品侵夺。在那个一两年中，凡储蓄洋色的商号，临时奇货可居，价格飞涨，不少人发了洋财。如东关兰香斋等家即是。

后来所谓洋色，我国也能以部分制造了。以红色言，已有了“酸性红”、“大红”、“枣红”等。英商进口货的“棉纱红”、“双猴红”等市场已将绝迹，因我国产品已取而代之。以目前而言仍赖进口货作刷色生产的，还有“粉红精”和“玫瑰精”。这两种作为刷梅红时打地子用。又如“盐基片绿”也是舶来品，仍在应用，以上都属于英国产

品。

九、销货季节和同行组织

每年的阴历八月节至阴历年底，是色纸畅销的兴旺季节。各作坊除在门市每日批发、应付客贩外，还另有所谓“外出门”的人员，他们从店中取货，带领着几辆小红车，赴外省、县镇推销。这类“外出门”人员，平时并非本店的雇用店夥，但他们都对这一行业各类货品熟悉，各都有其领销对象，也就是所谓“路分”，货到有主，店中给予一定的回扣。

除“外出门”人代为大量销货外，店中也派干员，带小车子外出销货。河南省的濬县，年年的阴历十月，有个出进一个月的大庙会，各地商贩麇集，为土产货品集散交流的总汇市场。届期聊城的各家作坊，把预储的色纸，帖套、信封信笺等货品、装车发运，纷纷前往。据说：赶下这个会来，销售的数量，足可抵全年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在会上卖得现金，投换天津汇票，百元中可得七至八元的“帖水”。

聊城的这些刷纸作坊，从营业性质上也可分为两种。行销本埠与外地，间做帖套、很少刷制杂色纸的，是比较大些的字号。如“启明号、议源号、东元恒、兴记号、鼎裕成、和生号”等，他们这几家大同行，有一个集体组织，叫“尚红会馆”，地址在东关清孝街西段的路南，涵洞附近。如今那地方已变为几簇民房，毫无遗迹可寻了。至于资金和经营规模比较狭小，多做杂色纸和帖套、信封信笺等家，一般称为小同行，这些小同行，也有个集会的团体组织，叫做“杂

色公所”（也叫“杂色会馆”，地方上呼为“小会馆”）这座公所，在东关闸口东太平街路南。院落也很阔绰，瓦房南北大殿、东西配房。花木扶疏、清静幽雅。北大殿塑有“葛仙翁”泥像，居然神清骨秀俨然若仙。这位葛仙，名葛洪，字稚川，晋元帝时人，善于制炼丹药，著有“抱朴子”一书。凡是油漆业、色纸作坊、染房等行业，都奉这位神仙为“祖师”，但他们根据什么？却无甚考证。据该行业人说：葛仙炼丹炉中有五彩云气冉冉而升，大概就以此道术神秘奥妙，就崇奉他为染色行业中的祖师爷了。

每年的阴历九月（外地也有在七月中）某日，就是葛仙诞辰，本城的凡属于此行业的人员，都来公所举行宴会以示庆祝，并借此团聚机会，商议业中事情，这一日很热闹，有一年还扎台演戏。当年“兴记号”的经理孙殿阳善于经营，并喜欢在同业之间种种周旋、排难解纷。很有点名望，染色公所的大殿中，有一个长达两丈多特织地毯，据说就是孙殿阳斥资捐入的。这座公所的宅院和部分房屋，至今尚存，然早已成为居民杂院了。

十、关于“梅红”和“丹红” 两种纸的用途

梅红和丹红两种纸的销路是相当广泛的。它的主要用途是：梅红可以印“报单”（科举时代应试得中功名，大门外例贴报单报喜、有光耀门楣炫示乡里之意）。表制对联、做帖套、婚书（旧社会中习俗，订婚时男女双方交换的红柬帖，上印有金黄色龙凤图案长达尺余装有封套）。更应用于

消耗最多的鞭炮包装。这类货品也是聊城的大宗外销特产之一，纯使梅红包装需用量很大。丹红纸多用于做招帖、广告、尤其写春联、为年年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讲究贴上一年不能褪色。盛销于鲁南各地。如泰安、汶上、曲阜一带地方习俗，新年贴上的春联，如果刚过了正月，就显出色泽黯淡，被认为这一年的运气一定不好。因此不惜花钱，买真好的丹红纸。

据说从前济宁的“玉堂酱园”，对于他所经营制造的各种调味副食品如腐乳、八宝小菜、辣酱泥、露酒等，都采用聊城的梅红和丹红纸，作货品瓶罐上的标签，因相信这类纸品的质量好，就是滴上些儿水珠，也不会变其鲜红的颜色。又据传说：有一年（一九三三年前后）济南有一家新开张的酱园，字号也叫“玉堂酱园”。济宁的玉堂认为他有意影射，就从聊城购要丹红纸百刀、统印为广告，遍贴于各府县城镇，以宣播他“并无分号”的声明。由此琐事，也足以看出旧时代中的工商业者、彼此斗争的尖锐，也说明了聊城丹红纸的鲜艳耀目，能引人注意。

丹红和梅红纸也有次品。纸胎和颜料都等而下之。纸的色泽非常淡薄，这属于扎彩铺所需的东西了。无论那种色纸，都是以“刀”作单位。每刀百张，另外有一张包皮印有字号和类似商标的简单图案，（有的小作坊每刀纸连包装皮也算入百张之数，称为“赖皮”。）

十一、目前色纸业经营情况

解放后聊城县的工商业者，踊跃地走上了集体合作化的

道路，色纸生产于一九六四年又进一步地提高质量，推广销路。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近年来销售数字并不见增加：

一、聊城的刷纸工人，在近几年来，就聘外地，或自营于津、济两地者为数颇多，如天津西南城角，济南盛唐巷，多系聊堂两地工人在该地经营。又如濮阳、菏泽、济宁、曲阜等地。也有不少的聊堂两县的刷纸工人，在那里干这一行业，或就聘于该地作技师。由于手艺传播，这种行业在四外各地更见蔓延。因而色纸生产，既不限于聊城一地，聊城出品销售的范围，也势必缩减，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外地的色纸经常地输入，也很影响地方产品的销路。有的质量欠佳而价格便宜。

三、过去的色纸，各有其主要倾销对象。如梅红用于帖套和考场的报单，火鞭包装又可占绝大比例数。近年来此类消耗已濒于无。杂色纸从前多耗于扎彩迷信品，今已绝迹。又旧社会中的商业广告、街头触目皆是，亦是消耗色纸的对象，今已无有了。

目前情况，“聊城文具生产合作社”出品的色纸，梅红纸等，质量方面有严格标准之要求，产品供应于各个供销社及中百公司，每年从七月份，开始刷梅红，月产一千至两千刀上下，杂色纸数目，或略有增减，其他四外乡村各个公社，也有搞副业生产刷色纸的，销售情况，尚无法统计。

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三年四月订稿